

民間學術團體的湧現 與 1980 年代中後期的「文化熱」(I)

錢理群¹

摘要：本文主要討論了 1980 年代中後期（1985-1989）五年間中國大陸知識界出現的「文化熱」。重點介紹和分析了《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中國文化書院、《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青年論壇》編委會、《新啟蒙》編委會五個民間思想文化學術團體，他們的指導思想、學術活動與思想成果；同時，對其中最具有影響的代表性學者，如金觀濤、李澤厚、湯一介、龐樸、甘陽、胡平、王元化的學術思想、貢獻，作了初步的分析。並將「文化熱」中大陸知識份子提出的述求概括為：要求改變單一的經濟現代化路線，進行政治、經濟、文化體制的全面的根本變革，實現政治民主、思想自由與學術獨立的「全面現代化」；要求以懷疑、批判為核心的科學精神對傳統文化、黨文化、西方文化進行全面反思，最終實現文化的多元選擇，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有機融合；要求徹底擺脫知識份子的依附地位，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同時不斷進行自我質疑。

關鍵詞：文化現代化、文化反思、新啟蒙、中國與世界

¹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退休）

The Emergence of Non-Governmental Academic Groups and the “Cultural Craze” in the Mid to Late 1980s (I)

Qian, Li-qun²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Cultural Craze” that emerged in the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Mainland China during the mid to late 1980s (1985-1989). It focuses on introducing and analyzing the five folk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academics: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owards the Future Series*, “Chinese Cultural Academy”, *Culture: China and the World*, *Youth Forum*, *New Enlightenment*, their guiding ideology,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ideological achieve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lars, such as Jin Guan-tao, Li Ze-hou, Tang Yi-jie, Pang Pu, Gan Yang, Hu Ping, Wang Yuan-hua’s academic thoughts and contributions, made preliminary contributions analysis: required to change a singl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course,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political democracy, freedom of thought and academic independence “comprehensive modernization”; It requires the scientific spirit with suspicion and criticism as the core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n tradi-

²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Retired).

tional culture, party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multiple choices of culture and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world culture; it is required to completely get rid of the dependent status of intellectuals and truly become the master of the country, while constantly questioning itself.

Keywords: cultura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reflection, new enlightenment, China and the world

一、生機勃勃的文化景觀

1981 年民間政治反抗運動被鎮壓以後，民間力量的兩種選擇：以陳一諮為代表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以溝通底層與高層，有限度地影響決策的方式，直接參與方興未艾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運動，起到了智囊團的作用；以陳子明、王軍濤為代表的「國情組」則力圖成為「以政治為靈魂，文化為形態」的「民間思想庫」，其最終目的是要成為「建設性的、負責任的中國政治反對派」，以另一種形式延續民間政治反抗運動。這兩種選擇儘管以政治、經濟、文化的戰略研究作為立足點，但卻有明確的政治實踐性的目的與特點，是自覺服務於 1980 年代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需要的，也可以說是民間知識份子參政的一種特殊形式。他們所期待的是黨和國家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與民間參與的自下而上的改革的互動互補與相互制約。

而我們在本文中所要討論的，則是第三種選擇，儘管也是知識群體的社會實踐，但卻有意識地與現實政治保持一定距離，用《走向未來》編委會的主持人金觀濤的說法，就是「在思想學術上大膽冒險，敢於創新，但在政治上絕不踩線」。³ 這不僅是出於政治安全的考慮，更是因為這個聚集在民間學術團體裡的知識群體認定，思想、文化的變革，比之經濟、政治體制的改革更具有根本性；思想文化的批判與創新，更是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界的知識份子的

³ 金觀濤：〈從《走向未來》到《河殤》——八十年代中國民間學術文化運動的研究〉，轉引自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中心，2008 年），頁 461。

用武之地，是其根本職責所在。他們所要做的，也是他們所期待的，是面對知識份子自身和廣大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思想解放與思想啟蒙。

而他們首先面臨的問題，卻是如何擺脫現有的將每一個人都限制在單位內，不允許相互之間發生組織聯繫的體制束縛，自行組織起來，形成「民間思想界」。也就是說，他們也需要和「發展組」、「國情組」一樣，在體制的邊緣、空隙處，尋找發展的空間。這就是在 1980 年代初期與中期，以和出版社合作的「叢書」編委會與民辦教育等形式組成的民間學術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原因所在。

於是，就有了這樣的文化景觀——

1983 年 6 月，《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正式成立，由包遵信任主編，金觀濤等為副主編，王岐山、何維凌、王小強、嚴家其等任編委，並寫有〈編者獻詞〉，表明期待叢書的出版能夠「展現當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日新月異的面貌；反映人類認識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記錄這一代人對祖國命運和人類未來的思考」。

1983 年 11 月、12 月，第一批《走向未來》叢書共七本正式出版。到 1984 年 6 月，共出版十二本。讀者滿懷好奇心打開書，就進入了一個新奇世界；這本《讓科學的光芒照亮自己》（劉青峰著）開口告訴你：「科學正以它神奇的力量改變著我們生存的世界和思維方式」，這是人們完全不知道，也從未想過的；接著的問題更是直抵正在緊張思考民族命運的人們的心靈：「為什麼近代科學技術結構沒有在遠比西方中世紀相對先進的中國產生？」最後又告訴你，可以用近代科學提供的新理論、新方法「控制論、系統論和資訊理

論」來重新思考這一切：⁴這更是第一次聽說。還有這本《GEB：一條永恆的金帶》（樂秀成編譯），用「一條永恆的金帶」把人們看來毫不相干「數理邏輯與繪畫、音樂」聯接在一起，據說「它還構成了奧秘的思維、人工智慧和生命遺傳機制的基礎」。⁵還有這本《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灌耕編譯），更是揭示了西方現代科學與東方古代哲學的內在聯繫，把它們看成是「人類精神的互補體現，一種是理性的能力，一種是直覺的能力」，只有兩者結合「才能更完整地理解世界」。⁶還有這本《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於人類困境的研究報告》（李寶恒譯），又發出警世之言：發展不是無限和無止境的，發展將引起能源和資源危機：這對於此時正對經濟高速發展充滿期待以至陷入幻覺的中國人，無疑是當頭棒喝。⁷以後叢書又收入《沒有極限的增長》（黃江南、朱嘉明、秦星編譯），對發展作出種種樂觀主義的預測：兩種發展觀形成鮮明對照，正是要引導讀者作獨立的思考與判斷。此外，還有這本《在歷史的表像背後——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的探索》（金觀濤著），這本《語

4 劉青峰：《讓科學的光芒照亮自己·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2、6、5。

5 樂秀成：《GEB：一條永恆的金帶·序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

6 灌耕編譯：《現代物理學和東方神秘主義·結束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243。

7 2008年《出版商務週報》在評選「三十年人物，三十年圖書」時，把《增長的極限》評為1983年最具代表性的圖書。2008年第九屆深圳讀書月評選「改革開放三十年三十本書」，《增長的極限》也入選。轉引自陳麗芳：《〈走向未來〉叢書出版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傳播學碩士論文，2013年），頁37。為行文簡潔之便，有關此文後續引文將以（陳麗芳，頁數）之形式直接註明。

言學和現代科學》(陳明遠編著)……,全都是長期處於封閉狀態的中國讀者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知識、新思維、新方法。真的就像金觀濤後來總結的那樣,「它用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我們過去所受的教育,把一代青年學子從過去對世界和歷史的單線條的公式化說教中解放了出來」。⁸

因此,完全可以想見,這樣一套真正是「全新」的叢書一出版就引起了爆炸般的反響。第一批書剛在成都書店上架,四個小時內就全部售完,許多狂熱的購買者紛紛趕來搶購。1984年3月,北京和上海書店也開始銷售,反響更為強烈。出版社決定再出版三十萬套,上海一地就訂購了五萬套。⁹第一批叢書每本印數都在12000冊左右,印數最多的是《現實與選擇:當代中國工業結構與體制》(朱嘉明、呂政著)初版13400冊,修改後的加印數就達14000冊。《激動人心的年代——世紀之交物理學革命的歷史考察和哲學探討》(李醒民著)、《GEB:一條永恆的金帶》也不斷重印,達五六次之多。(陳麗芳,頁68)

在此後的1985年、1986年、1987年、1988年又連續推出新書,從1983年11月到1988年5月先後出版了五批叢書,共七十四本,¹⁰

⁸ 金觀濤:〈八十年代一個宏大思想運動〉,馬國川編:《我與八十年代》(北京:北京三聯,2011年),頁172。

⁹ 金觀濤、陳方正:《從〈青年文稿〉到〈河殤〉》(*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9*),轉引自皮炯勳:《1980年代「科學」和「理性主體」的重建——以〈走向未來〉叢書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3年),頁9。為行文簡潔之便,有關此文後續引文將以(皮炯勳,頁數)之形式直接註明。

¹⁰ 原計畫出版一百種,已編輯八十八種,1989年已經付印的十四種,後因天安門事件發生,而被強迫停止出版。對已經出版的七十四種圖書在1989年

基本上每本印數都在五萬冊至廿萬之間，總計八百多萬冊。¹¹ 這些書就更鮮明地體現出《走向未來》叢書的啟蒙追求與特色。

首先是多學科、新興學科、邊緣學科的不拘一格的廣泛引入。據統計，按「中國圖書分類法」的標準，引入的圖書分類，就達三十四種，主要有：政治學、經濟學、哲學、文學、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國際關係學、美學、語言學、物理學、數學、地理學、宗教學、倫理學、人口學、藝術理論、神話學、自動化技術與電腦技術、資訊和知識傳播學、系統科學、文化理論、社科學理論與方論等等。學科的分支就更多，僅經濟學就有數理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經濟控制論、區域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等。還有許多新的分支，新興學科，如計量歷史學、發展社會學、定量社會學、社會生物學等：這裡的每一個學科都把人們引入新的領域，新的天地，讀著相應的著作：《經濟控制論》（何維凌、鄧英淘編著）、《看不見的手：微觀經濟學》（楊君昌編著）、《凱恩斯革命——宏觀經濟學》、《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茅于軾著）、《昨天，今天，明天——新技術革命與國際私法》（鄧

清查運動中，四川新聞出版社組織專人進行審查，結論是：「1986年前出版的三批圖書基本上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但由於包遵信、金觀濤兩人先後任該叢書的主編，顧問、編委中有嚴家其、陳一諮等人，（按，包、嚴、陳在「六四」後都是通緝對象，金觀濤也因為擔任《河殤》顧問而被牽連，不得不遠走香港）「1986年後期出版的一些書，都程度不同的塞進了他們的私貨」，「特別是1987年以後，有少數圖書成了他們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障地」，定為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有十一種。見龍春：〈《走向未來》命運如何？〉，《中國圖書評論》1990年第1期（1990年3月），頁132-133。

¹¹ 陳麗芳：〈對《走向未來》叢書編輯鄧星盈先生的訪談（2013年3月）〉（陳麗芳，頁95、98）。

正來編著)、《新的綜合：社會生物學》(李昆峰編譯)、《資訊革命的技術源流》(宋德生著)、《哲學的還原——哲學與語言分析》(田曉春譯)、《社會研究方法》(李銀河編譯)、《人的哲學——論「科學與理性」的基礎》(金觀濤著)等等，一直處於自閉狀態的中國讀者確實有「劉姥姥進大觀園」目不暇接之感，思想也由此進入一個新的境界。¹²

金觀濤在回顧這段歷史時，強調叢書在選題時，除了大量引進新知識、新思想、新方法外，還要求「有結合中國改革實際的」對當下的回應：¹³這也是區別於文化書院、「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的《走向未來》叢書的一個特色。實際上前文談到的第一批圖書中最受讀者歡迎的《現實與選擇：當代中國工業的結構與體制》就是討論當代經濟改革問題的；在此後的幾批書裡，也特意推出了《富饒的貧困——中國落後地區的經濟考察》(王小強、白南風著)、《發展的主題——中國國民經濟結構的變革》(周其仁、杜鷹、邱繼成著)。這兩部著作的作者都是農村發展問題研究小組的骨幹，是他們在參與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實踐中的理論思考。《富饒的貧困》就是他們到貴州山區進行調查研究以後提出的中國貧困地區發展的兩個重要思想：要科學看待所謂「落後」：「貧困」中有「豐饒」的資源，孕育著巨大的發展可能性；因此所謂「扶貧」不能只是「輸血」，而要激發其內生「造血」功能。這應該是最早提出的中國貧困地區發展理論。因此，書一出即引起強烈反響，也重印了五六次。

¹² 陳麗芳：〈對《走向未來》叢書編輯鄧星盈先生的訪談(2013年3月)〉(陳麗芳，頁22-23、82-85)。

¹³ 金觀濤：〈八十年代一個宏大思想運動〉，收入馬國川編：《我與八十年代》，頁171。

（陳麗芳，頁 68）

人們很容易就注意到，叢書的著譯者是以年輕人為主的。叢書的第一本《人的發現——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的作者李平晔，第一批圖書中最暢銷的《現實與選擇》的作者之一朱嘉明、《激動人心的年代》的作者李醒民，都是 1981 年畢業的碩士研究生。很多初出茅廬的年輕學者都是在叢書第一次出，由此出發，而成為此後學術界有一定影響的學者。除了前文已經提到的作者外，還有蕭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國近代士大夫與西方挑戰》），劉東（《西方的醜學——感性的多元取向》），崔之元（《增長、短缺與效率——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宏觀動態模型》），謝選駿（《空寂的神殿——中國文化之源》），何清漣（《人口：中國的懸劍》），葉舒憲（《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原型批評理論與方法》）等。（陳麗芳，頁 82-85）這大概也是一個共同追求，就像金觀濤說的那樣，「叢書不但啟發了一代讀者，而且培育了一代學者」。¹⁴ 用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者的說法，「我們面對著這樣被稱為『思考的一代』的兩部分人：饑渴者和盜火者。前者需要豐富多彩的精神食糧；後者需要『用武之地』」。¹⁵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金觀濤們的《走向未來》叢書就是因年輕一代中的饑渴者和盜火者的精神需求應運而生，也是作為作者與讀者的這兩種人共同創造的。徐友漁說，「在中國經歷了幾十年閉關鎖國，人們對外面的世界瞭解很少的情況下，那代年輕人基

¹⁴ 金觀濤：〈八十年代一個宏大思想運動〉，收入馬國川編：《我與八十年代》，頁 171。

¹⁵ 傅世梯：〈一切為了饑渴者和盜火者——對《走向未來》叢書的一點回顧和思考〉，《中國出版》1986 年第 7 期（1986 年 7 月），頁 31。

本上都是靠這套叢書接觸新知識的」，¹⁶事實也確實如此：1984、1985、1986 年在校的大學生，在回憶自己的大學生活時，都會談到當年對《走向未來》叢書的「熱衷和熱誠」，強調：「它們真正激勵和影響了一兩代學子」。¹⁷1986 年 8 月，編委會又創辦《走向未來》雜誌，創刊號發表了李澤厚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產生了很大影響。至 1988 年 12 月，刊物共出版八期。

1985 年 1 月，中國第一所民辦教育研究機構「中國文化書院」成立。馮友蘭、張岱年為名譽院長，湯一介為院長，梁漱溟任院務委員會主席，張岱年任學術委員會主席。文化書院提出三項宗旨，一是繼承並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大力推行中國文化的教學科研活動；二是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與世界各國學術進行廣泛的對話；三是開展中外文化比較研究。書院先後聘任近七十名人文社會科學專家教授為書院導師，其中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香港、臺灣的著名學者。

3 月，書院即以「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為主題，在北京舉辦第一期「文化系列講習班」，聽課學員 200 人，來自全國各地，集中學習了一個月，產生了廣泛影響，可以說是開創了 1949 年之後大型民間講學的先河。此後的 1986 年 1 月、8 月、12 月，又連續舉辦了三期講習班，主題分別為「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科技與文化」和「文化與未來」。四期講習班學員總數越三千人；而講座的四大講題都是前沿的重大文化課題，在思想文化領域顯然起到了引領作用。主講者又都是國內外的一流學者：有梁漱溟、馮友蘭、張

¹⁶ 徐友漁：《中國三十年各派社會思潮》（2009 年 2 月 28 日在三味書屋的演講稿）。

¹⁷ 伊人：〈改革開放初期，讀書人讀什麼書〉，轉引自陳麗芳，頁 36。

岱年、季羨林、周穀城、周一良、任繼愈、侯仁之、牙含章、陰法魯等老一代學者，李澤厚、湯一介、龐樸、樂黛雲、陳鼓應等中年學者，以及杜維明、成中英、鄒讜、魏斐德等外國學者。其中還有醫學、建築、電腦、心理學、科技管理學的專家教授。這不但為長期受到壓制的老一代知識份子提供公眾講臺，為同樣長期受到限制的中年一代的知識份子提供用武之地，從而為新時期的文化傳承，開創了一個新的空間；更為長期處於封閉狀態的中國知識界打開了一扇與國際學術界進行思想文化交流的視窗：這都在思想文化學術界引起了爆炸性的反響。

1987年5月10日，文化書院主辦的「中外文化比較研究」函授班開學，二年制學制，面對全國招生。第一年註冊學生12754人，學員遍佈全國各省、自治區，新疆、西藏都有。他們中有大學教師、科研人員，還有軍隊政工幹部、企業領導、機關幹部、農村基層幹部。據樂黛雲回憶，她到基層面授，參加者「大都是中小學教師，中下層幹部，特別是文化館、宣傳部的幹部，也有真正的農民和復員軍人。他們有的從很遠的山區和邊遠小城徒步趕來，扛著一口袋乾糧和裝著紙筆和幾本書的土布書包。他們不願花錢租一個為他們安排好的學生宿舍在、床位，就露天鋪張草席在屋簷下火涼亭裡睡覺。」¹⁸ 那是一個人人都渴望新知識、新思想、新方法的時代，講習班開設的十五門課程，如「文化學概論」、「比較方法論」、「中國文化概論」、「西方文化概論」、「日本文化概論」、「印度文化概論」、「比較哲學」、「比較史學」、「比較文學」、「比較美學」、「比較教育學」、「比較宗教學」等等，對許多青年學生，普通幹部、底層文化人，都是聞所未聞的，由此煥發的知識圈內、

¹⁸ 樂黛雲：《何處是歸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頁154。

圈外的普遍學習熱情，是很能顯示 1980 年代的特點的。文化書院還和共青團中央、社科院研究生院合辦「經濟管理和行政管理函授班」，和地質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聯合舉辦「經濟與行政管理專業中證書班」，和環保局合辦環保班。環保班後來就發展為「中國文化書院綠色分院」，也叫「自然之友」，這是中國第一個民間環保組織，影響是深遠的。

文化書院還主辦和參與舉辦了一系列的學術討論會，如「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與前途」（1985 年 3 月），「梁漱溟思想國際學術討論會」（1987 年 10 月），第一次「海峽兩岸文學討論會」（1988 年 1 月），「中日走向近代的道路」學術討論會（1989 年 4 月）。「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1989 年 5 月），「中國宗教的過去與現在」學術討論會（1989 年 5 月），也都產生了廣泛影響。會議的論文，講習班的講稿，函授班的教材，後來都彙集成書，作為「中國文化書院文庫」出版，其中即有論文集《論傳統與反傳統》、《中國宗教：過去與未來》、《馮友蘭先生紀念文集》，演講錄《論中國傳統文化》、《中外文化比較研究》、《文化與科學》，教材《中外比較文化教學叢書》等十四種，《臺灣及海外中國文化論叢》等。同時編輯出版還有《中國文化年鑒》和《中國文化與文化中國叢書》（收有湯一介、龐樸、杜維明、成中英、韋政通的專著），《魏晉南北朝文化史叢書》（收有湯一介、許抗生、李中華的專著）都可以看作是中國文化書院的理論成果。¹⁹

¹⁹ 參看常華：〈中國文化書院大事系年（1984-1994）〉、王忠：〈中國文化書院學術研究成果（1984-1994）〉，收入《文化的回顧與展望——中國文化書院建院十周年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54-60、68-73。湯一介：〈「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湯一介先生談中國文化書院〉，《在非有非無之間——湯一介先生自述》（鄭州：河南

1986 年 6 月，醞釀於 1985 年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在北京成立，以甘陽為主編，編委會主要成員有蘇國勳、王煒、王焱、趙越勝、陳維綱、周國平、徐友漁等，多為北京大學、中國社科院研究西方人文學的研究生、年輕學者，也還有陳來、閻步克、陳平原、梁治平等研究中國哲學、歷史、文學和法學的研究生、年輕學者。在可以視為編委會宣言的〈《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總序〉裡，引述梁啟超之言，「今日之中國欲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事」，並宣佈，「《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支持下，創辦《現代西方學術文庫》，意在繼承前人的工作（〈總序〉特意提到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錢注），擴大文化的積累，使我國學術譯著更具規模、更見系統。文庫所選，以今已公認的現代名著及影響較廣的當今世界重要著作為主，旨在拓展中國學術思想的資源」。〈總序〉最後表示：「我們深信，隨著中國學人對世界學術文化進展的瞭解日益深入，當代中國學術文化的創造性大發展當不會為期太遠了」。²⁰

1986 年 12 月，《西方現代學術文庫》推出第一本《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文選》（尼采著，周國平譯），即轟動讀書界與學術界，首印五萬冊，當年銷售十五萬冊。此後 1987-1989 年連續推出的《存在與虛無》（〔法〕薩特著，陳宜良等譯，杜小真校，1987 年 3 月出版），《存在與時間》（〔德〕海德格爾著，陳嘉映、王慶節譯，熊偉校，1987 年 12 月出版），《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德〕韋伯著，于曉、陳維綱等譯，1987 年 12 月出版），《資本主義文

文藝出版社，2017 年），頁 168-173。

²⁰ 編委會：〈《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總序〉，《《文化：中國與世界》三十年（1986-2016）》（上海：三聯書店，2016 年）。

化矛盾》（〔美〕丹尼爾·貝爾著，趙一凡、蒲隆、任曉晉譯，1989年5月出版）。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美〕亨廷頓著，王冠華、劉為等譯，沉宗美校，1989年7月出版），《在約伯的天秤上：靈魂中的漫遊》（〔俄〕舍斯托夫著，董友、徐榮慶、劉繼嶽譯，1989年7月出版），以及《語言與神話》（〔德〕凱西爾著，於曉等譯，1988年6月出版），《符號學原理：結構主義文學理論文選》（〔法〕巴爾特著，李幼燕譯，1988年11月出版），《接受美學譯文集》（劉小楓編選，1989年1月出版），《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德賴爾》（〔德〕本雅明著，張旭東、魏文生譯，1989年3月出版），《俄國形式主義文選》（〔俄〕什克洛夫斯基等著，方珊等譯），《審美之維：瑪律庫塞美學論著集》（李小兵譯，1989年8月出版），等等，也都引起爆炸性反響。連《存在與時間》和《存在與虛無》這樣的艱深的著作也達到當年銷售七萬和十萬的記錄，如研究者所說，「這在全世界的出版史上都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²¹ 更為重要的是，20世紀西方哲學的主要流派和人物，如存在主義的海德格爾、薩特，英美語言哲學的維特根斯坦，精神分析學派的佛洛德，解釋學的伽達默爾，都因此得以完整地引入中國。評論者對此評價說，這樣的「於當代西方人文學術之引介，涵蓋之廣，規模之大，為五四以來所僅見。這種全方位的西方學術文化的引介，如果不受到阻礙干擾，對當代中國學術界的啟蒙意義十分深

²¹ 仲維光：〈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研究（一）——北京文化叢書派的工作及思想〉，仲維光、還學文：《意識形態陰影下的知識份子》（Bochum：Brockmeyer，1994年），頁28。

遠」。²²

1986 年 12 月，《文化：世界與中國》編委會和三聯書店又推出了《新知文庫》，「這套以『廣大讀者』為物件，以傳播、介紹新知為主的小開本袖珍叢書」「不僅篇幅短小，輕鬆好讀，而且內容是否豐富，可以讓當時求知欲旺盛的中國普通讀者最快第獲得西方（包括日本）的有關人物、思想、制度、文化等各方面概觀性知識」。據「《讀書》服務日之頁」介紹，《新知文庫》主要選擇「西方學術文化名人傳記」、「對世界各種不同學說、理論進行詮釋解釋的作品」，「亦有一些為世公認的篇幅較小的名著」。中國的普通讀者正是借助於《新知文庫》的視窗，第一次結識了勞倫斯、喬伊絲、福澤諭吉、瓦格納、韋伯、薩特、雅思貝爾斯、里克爾、普魯斯特、湯瑪斯·曼、紀德等西方、日本的現當代文化名人；第一次接觸了「存在哲學」、「榮格心理學」、「成長心理學」、「法律哲學」、「歷史哲學」、「宗教哲學」、「語言哲學」、「教育哲學」、「數學哲學」、「邏輯哲學」、「超現實主義」、「表現主義」、「文學結構主義」、「權力社會學」等等新興學科；第一次讀到了《我與你》（馬丁·布伯著，陳維綱譯）、《西西弗的神話（論荒謬）》（加繆著，杜小真譯），《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康得著，鄧曉芒譯），《禪與日本文化》（鈴木大拙著，陶剛譯）等世界名著。1987 年 6 月，《文化：中國與世界集刊》創刊，至 1988 年 11 月共出刊五期，這是為編委會成員開創一個「重要思想陣地」，同時「為海內外學者提供學術園地」。這就意味著《文化：中國與世界》編

²² 陳來：〈思想出路的三動向〉，《《文化：中國與世界》三十年（1986-2016）》，頁 110。

委會已經不滿足於西方（日本）當代學術的翻譯和介紹，而要開始獨立的研究與創造。《集刊》第一輯發表的主編甘陽的〈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全面闡釋了編委會成員關於文化問題的基本觀點（下文將有詳盡分析）；各輯先後刊發了馮友蘭、季羨林、熊偉、余敦康、李澤厚、余英時、杜維明、蘇國勳、劉小楓、陳來、陳嘉映、王慶節、周國平、何光滬、鄧曉芒、閻步克、梁治平、陳平原、夏曉虹、錢理群、張隆溪、

張旭東、崔之元、徐賁等當時各個年齡段優秀學者的文章，重要論題集中於中國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這些學者，特別是其中的中青年一代，在此後 1990 年代、21 世紀初以至今日，都是中國人文學科的中堅力量、領軍人物，確實作到了「出書，出思想」更「出人」：這應該是「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以及同時期的其它編委會的共同特色和貢獻。

1988 年 3 月至 1991 年編委會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推出了《人文研究叢書》十二種，其中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中西方詩人對世界的不同態度》（1988 年 4 月）、蘇國勳《理性化及其限制：韋伯思想引論》（1988 年 3 月）、杜小真《一個絕望者的希望：薩特引論》（1988 年出版）、俞建章、葉舒憲《符號：語言與藝術》（1988 年 4 月）、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1988 年 3 月）、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1991 年 8 月）、汪暉《反抗絕望：魯迅的精神結構與〈吶喊〉〈彷徨〉研究》（1991 年 8 月）、錢理群《周作人論》（1991 年 8 月）、趙園《北京：城與人》（1991 年 8 月）、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法律研究》（1991 年）。經過歷史的淘洗，這些著作都可以看作是 1980 年代哲學、文學、

法學研究的代表性理論成果，顯示了一個時代的學術水準。²³ 1986 年 8 月，中國政治與行政發展研究中心與華夏出版社合作的《二十世紀文庫》召開編輯出版工作會議；在 10 月制定的〈編輯出版規劃〉裡，明確提出「為了推動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完善社會科學的學科建設；為了向中國的改革提供廣泛的理論、資訊」，決定編輯出版「二十世紀文庫」，「側重於 20 世紀以來國外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名著翻譯；20 世紀以前出版，但對當代社會科學仍有影響的名著也適當選入」，「在學科上側重於 20 世紀新發展起來或發展變化比較大的學科，如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法學、哲學、經濟學等；史學、文學藝術理論也適當覆蓋」，「邊緣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也在入選之列」。這樣，繼《走向未來叢書》強調引入西方自然科學新知識、新方法，《文化：中國與世界》著重介紹 20 世紀西方人文學科經典，中國文化書院提倡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認識與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之後，《二十世紀文庫》又自覺承擔起 20 世紀國外社會科學名著翻譯的重任，這就形成了 1980 年代文化熱（譯介、研究）的完整格局。

1987 年 2 月，《二十世紀文庫》推出最初一批書時，宣佈編委會主編鄧樸方，常務編委李盛平、張顯揚、陳子明、黎鳴等，編委劉再復、李澤厚、何家棟等，以後常務編委增補了沈志華，編委孫立平、王焱等。其實際主持人是李盛平，主要骨幹也都是我們曾經討論過的陳子明為首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團隊」的成員。《二十世紀文庫》之下，還有兩種子叢書，即《現代文化叢書》（《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現代社會與文化叢書》（中國國際廣播

²³ 以上關於《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材料，均來自《《文化：中國與世界》三十年（1986-2016）》。

出版社出版)，三套叢書共出書一百一十六種。

李盛平於 1989 年主編了《政治體制研究叢書》，共十四種，其中《當代世界政治體制》、《各國公務員制度》、《控制論與社會改革》、《城市政治學》等都是自覺地為當時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思想資源。陳子明本人則主編了《外國著名思想家譯叢》（工人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現代化與政治發展》叢書和譯叢（寧夏出版社出版），《青年理論家文稿》叢書（與何家棟共同主編，寧夏出版社出版）。²⁴

陳子明和徐友漁在討論 1980 年代的「叢書熱」裡，還特意提到了《傳統與變革》叢書，稱其「力圖以生動明快的風格，普及新的倫理觀念和法治觀念」，由王潤生任主編，副主編是許醫農、楊利川，編委有鄧偉志、石小敏、齊海濱、吳稼祥、楊百揆、張維迎、梁治平等。此外，還有《貓頭鷹文庫》、《20 世紀西方哲學譯叢》等，都有各自的影響，從而構成了「眾聲合唱」。²⁵

不可忽視的，是我們討論的 1980 年代民間文化團體，並不局限於北京。人們經常提的，就有武漢李明華主編、王一鳴為社長的《青年論壇》，上海王元化主編的《新啟蒙》，陳奎德主編的《思想家》雜誌、韓少功主編的《海南紀實》等，這都是以民間刊物形式出現的民間獨立思想者、文化人的聚合，而且都是面對全國發言的。²⁶ 我們將在下文對《青年論壇》和《新啟蒙》作專門的討論。

²⁴ 以上關於《二十世紀文庫》等的介紹，見陳子明、徐友漁：〈關於八十年代思想派別與《二十世紀文庫》的通信〉，《陳子明文集（第 2 卷）》（香港：世界華文傳媒出版機構，2010 年），頁 11、19-24。

²⁵ 陳子明、徐友漁：〈關於八十年代思想派別與《二十世紀文庫》的通信〉，《陳子明文集（第 2 卷）》，頁 13、27。

²⁶ 關於韓少功和《海南紀事》，可參看馬國川：〈韓少功：歷史中的識圓行方〉，

二、「惡夢醒來是黎明」

在對 1980 年代中後期（1985-1989）短短五年間出現的「文化熱」，作了以上掃描式的現象形態的事實描述以後，我們大概有兩個印象：一是它的自發性、民間性，和建國以後所有的思想文化運動不同之處，不僅它是建設性的，而非批判性的，更在於它不是有領導、有計劃、有組織的自上而下的黨主導的國家行為，而是民間學術團體自下而上的自發行爲。但我們同時也強烈感到其彼此之間的默契，自有一種「不約而同」的密切配合。這顯然是因為它們都是對同一時代呼聲的回應，並因此在思想、認識上形成了某種共識。

這樣，我們就需要回到 1980 年代的歷史情境之中，具體考察在什麼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了怎樣的問題意識，提出了怎樣的歷史命題與使命？當時的思想、文化、知識界又作出了怎樣的回應？

有一位研究者對 1980 年代有過一個概括，說那個時代和生活在此期間的知識份子，都是「歷史的中間物」：「一方面，它作為『文化大革命』的結果而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是改革開放的開端」。因此，「1980 年代充斥著『脫文革』與『文化重建』這兩個維度的內在緊張。在文革的創傷之上重構、奠定思維的基礎，業已成為 1980 年代中國知識界的頭等大事」。應該說，這一概括是有道理的，深刻的。（皮炯勳，頁 1）²⁷

「惡夢醒來是黎明」。如金觀濤所說，處於這一歷史的轉折、過渡時期，中國的社會、思想、文化，中國知識份子，以至每一個

《我與八十年代》，頁 205-218。

²⁷ 這是我所見到的迄今為止關於 1980 年代「文化熱」的研究，最有分量的學術論文之一，它對我有很大啟發。

中國人，都面臨著「我們是從哪裡來的，又究竟要到哪裡去？」的歷史拷問：²⁸ 要從「惡夢」中真正「醒來」，就需要弄清「我們從哪裡來？」，對文革思想、文化上的歷史重負進行徹底清理；要面對「黎明」，走向未來，就要辨認清楚「要到哪裡去」，進行新的思想解放，尋求新的思想資源，新的文化發展空間，激發新的創造力與想像力。

在許多歷史當事人的記憶裡，文革是一場「文化浩劫」，而且是有充分根據的。文革一開始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就明確提出了要批判「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²⁹

什麼是毛澤東要通過文化大革命徹底批判，最後使之「消失」的「舊思想，舊文化」以及相應的「舊風俗，舊習慣」呢？這集中體現在文革中最流行的一句口號上，即所謂「徹底批判封、資、修」，這就意味著：一要在「批判封建主義文化」旗號下，全盤否定並消滅中國傳統文化；二要在「批判資產階級文化」旗號下全盤否定並消滅西方文化；三要在「批判修正主義文化」旗號下全盤否定並消滅蘇聯社會主義文化及中國自己的左翼革命文化以至建國後十七年的文化：毛澤東修訂、批准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就明確提出，對蘇聯作品「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1930 年代「左翼的某些領導人」推行

²⁸ 金觀濤：〈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學〉，《我的哲學探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 3。

²⁹ 人民日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 年 8 月 8 日通過），《人民日報》第 1 版（1966 年 8 月 9 日）。

修正主義的「黑線」；³⁰毛澤東自己則宣稱建國後的十七年文化領域「至少一半不在我們手裡」，實行的是資產階級黑線專政。³¹這背後還隱含著對馬克思主義的貶抑，集中體現在林彪所說的兩句話上：「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高得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太多，讀不完，他們離我們有太遠。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我們要 90% 的學習毛澤東著作」。這裡的意圖是明顯的，就是要以所謂「最高、最活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文化領導、取代一切。時為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在文革一開始就提出了這樣的「毛澤東思想中心論」：「全世界的文化是從東方開始的，（後來）從東方轉到西方，現在又轉了一個圈，又回到東方來了」，「在東方起來的這個新文化比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高得多。這個新文化的創造者是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人民群眾、中國無產階級」。³²文革就是要將這樣的「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中國新文化」，置於高於人類、民族一切文化之上的中心地位，「既比西方文化高明，又是東方文化的最高代表」。這樣的打著「中華中心主義」印記的，以「和一切傳統思想、文化徹底決裂」的激進主義姿態出現的「毛澤東思想、文化中心論」，必然

³⁰ 參看毛澤東：〈對〈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批語和修改〉（1966年3、4月），中央文獻出版社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25-27。

³¹ 毛澤東：〈在聽取西南三線建設工作彙報時的講話〉（1964年11月28日），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頁1227。

³² 陳伯達：〈在中國科學院萬人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7月30日），轉引自劉曉：《意識形態與文化大革命》（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頁176-177。

導致文化專制主義。這也是毛澤東在文革一開始就公開宣稱的：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實現「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在黨（毛澤東）代表的無產階級與黨內外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之間的關係，只能是「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³³這就是所謂「思想文化領域的全面專政」論。³⁴

而且這樣的全面專政論在文革中迅速轉化成了億萬人的「革命實踐」。於是，就有了文革初期（1966年8月）的「破四舊」，即紅衛兵宣稱的「批判和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運動。這是秦始皇時代的「焚書坑儒」在毛澤東時代的再現，造成了歷史文物、民族文化的一次大劫難。同時發生的是「紅色恐怖」，即所謂「把一切牛鬼蛇神打入十八層地獄，再踏上千萬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校園裡的老師自然首當其衝，社會上的「文化人」，即與文化多少沾點邊的人（資本家，知識份子，出身大家族的，稍有文化的普通市民，等等）都成為「大抄家」的重點，當時稱作「掃除封、資、修（思想文化）的殘渣餘孽」。³⁵隨後文革

³³ 毛澤東：〈對中央關於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通知稿的批語和修改〉（1966年4月），中央文獻出版社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0-41。

³⁴ 姚文元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1968年8月）裡，將「全面專政」概括為「四個消滅」，除要消滅「一切階級差別」，由此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與之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之外，還要消滅由之產生的「一切觀念」。

³⁵ 參看錢理群：〈歷史當事人口述中的北京中學生紅衛兵運動，第七節：8月18日：紅衛兵走向社會，「破四舊」與「紅色恐怖」〉，《燭火不息：文革民間思想研究筆記（上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年），

中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無論是 1966 年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還是 1968 年派遣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打破知識份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³⁶ 以及 1968 年的「清理階級隊伍」；1969 年將黨政機關、文化部門、高校的幹部和知識份子驅趕到「五七幹校」進行勞動改造和思想清洗；1970 年的「三反（打擊反革命分子，反對貪污浪費，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運動」；直到文革後期，1974 年發動「批林（林彪）批孔（孔子）運動」及相應的「批儒評法」，1975 年的「教育革命大辯論」，隨後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無一不是以知識份子為革命物件，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一個「反知識份子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知識份子時，始終有一個重點，即他們對人類文明（無論是中國傳統文化、現當代文化、革命文化，還是西方文化、東方文化、蘇聯文化）的關注、學習、翻譯、研究。在批判者的邏輯裡，這都是知識份子的「原罪」，對世界、民族文化認識、研究越深湛，罪惡越深重。在這個意義上，文革又是一個「反文化」的運動。而且打擊面極廣，不僅是我們重點討論的知識份子，任何人，無論是工人、農民，還是士兵、市民，無論是老年人，中年人，還是年輕人，只要讀毛澤東著作之外的任何書，無論是「封、資、修」，還是馬列主義原著，都有可能以「偷讀禁書」的罪名而獲罪。³⁷ 耐人尋味的是，即使是文網恢恢，但仍然阻擋不了躲過「焚

頁 238-247。

³⁶ 毛澤東：〈對姚文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的批語和修改〉（1968 年 8 月），中央文獻出版社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531。

³⁷ 參看錢理群：〈一個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的命運〉，《燭火不息：文革民間

書」之劫的「封、資、修」書籍在民間的流傳，特別是知青中的地下讀書活動，使得偷食禁果的文革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開始接觸到人類文明的碩果，從而喚起了對封閉的鐵籠之外的世界的無限嚮往。這樣，到文革結束時，中國已經成為一片文化荒漠，所有的知識份子和普通民眾，都陷入了成為民族和人類文化的棄兒的恐懼之中，同時又充滿了對完全陌生化的中國和西方傳統思想文化和未知的新知識、新思想、新文化的渴望。這樣的全民族的文化恐懼症、饑渴症，構成了真正的民族文化危機，同時又孕育著新的文化轉機。

這就是我們在前文中所描述的 1980 年代中後期勃然興起的「文化熱」，如李澤厚所描述，「從北京到上海，從官方到民間，從研究生、大學生，到老學者，老教授，統統出場」的時代、歷史的，知識份子和國民心理的原因。³⁸ 這樣的空前的全知識界、全民族的文化反思、重新學習與創造的熱情，是後來人不可想象、絕難理解的。如果不深入到幾乎不可重複的歷史情境之中，僅憑後設的文化立場，是很難作出有說服力的描述與判斷的。

我們還是回到歷史的現場。

在文革結束後，人們從「『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中國，是世界人民的革命燈塔」的「迷夢」中「驚醒」過來，開始了對文革中的文化迷誤的反思，³⁹ 並作出新的選擇，逐漸形成了某些共識。

我們來看寫於「文化熱」高潮的《文化：中國與世界》集刊〈開卷語〉——

思想研究筆記（下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843-884。

³⁸ 李澤厚：〈漫說「西體中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 年），頁 311。

³⁹ 李澤厚：〈漫說「西體中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頁 312。

中國要走向世界，理所當然地也要使中國的文化也走向世界；中國要實現現代化，理所當然地必須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這是八十年代每一有識之士的共同信念，這是當代中國偉大歷史騰飛的邏輯必然。

《文化：中國與世界》正是在這樣一種時代氛圍中誕生的。她以『文化』作為戰略研究物件，力圖對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過去、現在、未來進行全面的、持久的、深入的總體性研究和系統性比較，以此為建設當代中國文化作堅實的理論準備和艱苦的實踐探索。

當代中國文化的建設和形成必須具備三個最基本的要求和環節：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二，繼承中國文化傳統，光大中國文化傳統；三，吸取世界文化成果，把握世界文化趨勢——《文化：中國與世界》以此三點作為她的基本方針和奮鬥目標。為富有想像力地創造出當代中國文化的嶄新形態，為滿懷自信地眺望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交融會合的遠景，我們願意竭盡綿薄，與大家共同努力。⁴⁰

這是可以視為一份「宣言書」的，其可注意處有三。其一，是「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命題的提出。就《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而言，這大概是他們的文化觀的核心，如甘陽所說：「現代化，歸根結底是『文化的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只有最終落腳在一種新的現代中國文化形態上，才算有了真正的根基和鞏固的基礎，否則其他方面的現代化或者將難以完成，或者甚至得而復失。」⁴¹ 強

⁴⁰ 編委會：〈《文化：中國與世界》集刊開卷語（1987年1月）〉，《「文化：中國與世界」三十年（1986-2016）》，無頁碼。

⁴¹ 甘陽：〈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八十年代文化意識》（上海：

調「文化的現代化」應該是 1980 年代中、後期民間思想學術團體的一個共識。文化書院代表人物湯一介就明確提出，「要真正現代化必須是全面現代化，你不能只是一個方面的現代化」。他回憶說，1985 年他們在深圳召開「文化協調會議」，除北京的學者外，還有上海的王元化、武漢的肖箏父、西安的陳俊民，也請了美國的杜維明，會議發表了一個紀要，認為「中國只提四個現代化是不夠的，除了科技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還必須政治現代化和文化現代化，才是一個完整的現代化」。⁴² 實際上，「全面現代化」也是當時的民間運動的一個共識，1980 年代初的民間刊物、學生競選，以及黨內民主派推動的「庚申變法」都以「實現全面現代化」作為自己的改革旗幟。⁴³ 這裡，正是突顯了鄧小平代表的「官方」改革運動與「民間」改革運動的根本分歧。

湯一介有一個分析。他說，「中國共產黨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綱領，和「改革開放」的方針，它無疑是針對「以階級鬥爭為綱」和「閉關自守」的一個路線上的大轉變。學術文化界當然是擁護這一方針和路線的。但同時鑒於歷史的經驗，只把「現代化」限於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文化層面是否又會使我們再一次失去實現全面現代化的時機。於是不少學者提出，「『現代化』除了科學技術和經濟管理的現代化外，還應包括政治的現代化和思想觀念的現代化，以求得中國大陸的社會由『傳統』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7。

⁴² 湯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收入馬國川編：《我與八十年代》，頁 37。

⁴³ 參看錢理群：〈1978-1980 年的理論風雲〉、〈1980 年的校園民主運動〉的相關論述。錢理群：《未竟之路：1980 年代民間思想研究筆記》（書稿尚未出版）。

走向『現代』。這裡所說的『傳統』既包括幾千年形成的『舊傳統』，也包括幾十年形成的『新傳統』。⁴⁴ 應該說，這是一個精當的分析，既說清楚了當時的學術文化界、知識界對鄧小平主導的改革既擁護、支持，又有分歧並心存疑慮的複雜態度，而所說的「由『傳統』走向『現代』」裡的「傳統」，既包括「舊傳統」也包括共產黨領導「幾十年形成的新傳統」，更是抓住了要害：對鄧小平所代表的執政黨的既得利益者而言，毛澤東的錯誤，文革的失誤（如「階級鬥爭為綱」，「閉關自守」）都是局部的，只需作某些調整（如「以經濟建為中心」代替「階級鬥爭為綱」），而以共產黨領導為核心的基本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由此形成的「新傳統」，不但無須改革，還要加以維護和鞏固。在 1981 年 6 月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裡，在談到了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錯誤以後，仍然強調毛澤東思想「是被實踐證明瞭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⁴⁵ 以後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實際上都是在堅持一條思想文化路線，我們或許還是可以用中國近現代曾經有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來概括，但卻有了新的歷史內容：所說的「中學」，就是「毛學（毛澤東思想、文化）」，而又強調「毛學」是「中國共產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因此，實際上就是「黨學（黨的思想、文化）」，而

⁴⁴ 湯一介：〈古今東西之爭與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文化的回顧與展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83。

⁴⁵ 人民出版社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104-1139。

且它不僅以毛澤東思想、文化為代表，隨著黨的領導人的變動，又是可以以黨的新領袖的思想、文化作為「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來代表的。而所說的「西學」，除了西方思想、文化之外，也應該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學」在內，它們都是可以為「黨學」（黨的領袖之學）所用的。這樣一個「黨學為體，西學、中學為用」的「新傳統」，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中國特色的新文化」，它是為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服務，是黨的統治須臾不可離，任何情況下，都要堅持的。這樣的「新傳統」，不僅是文革前的十七年的思想、文化路線的延續和發展，而且和文革的思想、文化路線也是相通的：我們在前文討論的文革的「毛澤東思想中心論」，即以「中國特色的新文化」引領、改造世界和人類文明的夢想，對中國的執政者和民族主義者始終是有誘惑力的。

從這樣的思想文化全域來看，我們討論的 1980 年代中後期民間思想者學術團體提出的「文化現代化」的命題，是最能顯示其民間特色和本性的。如湯一介所說，它認同「現代化」，自然就有對鄧小平所代表的官方改革的支持的一面；但它強調「文化現代化」也即「全面現代化」就有衝破官方設置的「單一的經濟、科技改革」的限制的這一面。特別是它追求「傳統」的「現代化」，不僅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批判，改造，創造性轉化），也包括對中國共產黨的黨文化的批判、改造，創造性的轉化，這就隱含了對現行體制、主流意識形態的挑戰。這就決定了，1980 年代的文化熱，從表面上看，似乎一路風風火火，勢不可擋，但實際上官方並未放棄管控，不斷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敲打思想文化界，是內含著一種緊張的。而最後當中國年輕一代和知識界提出「思想、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的要求，遭到官方嚴厲鎮壓時，我們這裡討論的

幾乎所有的民間學術團體都以不同形式參與到民間反抗運動中，就絕不是偶然的。

這裡還要作一點補充：這些民間學術團體最初提出「文化現代化」的命題，是從對歷史的經驗的總結為出發點的。前引湯一介的講話裡，就提到「從清末就要搞什麼現代化，每一次現代化被打斷的原因之一，就是單純考慮經濟，沒有考慮文化、政治，所以被打斷了，夭折了，做不下去了。建國後大講特講的現代化也被打斷了，因為沒有一個政治現代化和文化現代化相配合，光是經濟現代化很可能會走彎路的」。⁴⁶ 因此，人們在 1980 年代談論文化現代化時，總是要回顧 19 世紀末中國敞開大門，「西學東漸」時所走過的歷程。李澤厚在他的很有影響的《漫說「西體中用」》裡，就談到了當年經歷的「科技——政治——文化三個階段，亦即洋務運動——戊戌、辛亥——五四三個時期。由船堅炮利振興實業以富國強兵，到維新、革命來改變政體，到文化、心理的中西比較來要求改造國民素質」。⁴⁷ 歷史似乎正在重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1980 年代的改革開放正是中國在重又經歷了「閉關自守」的歷史以後，第二次打開大門，而且如甘陽描述的那樣，「自十年動亂結束，現代化的任務被重新提出以來，中國人走了三步才走到文化這個問題上來：首先是實行對外開放，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然後是加強民主與法制並進行大踏步的經濟體制改革，因為沒有相應的先進管理制度，先進技術有等於無；最後，文化問題才提到了整個社會面前，因為政治制度的完善、經濟體制的改革，都直接觸及到了整個

⁴⁶ 湯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收入馬國川編：《我與八十年代》，頁 37。

⁴⁷ 李澤厚：〈漫說「西體中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頁 312。

社會的一般文化傳統和文化背景、文化心理與文化機制」。⁴⁸ 因此，許多人在評價 1980 年代的文化熱時，都要將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相聯接。

或許正因為如此，人們都注意到，1980 年代的文化熱的中心議題，也即《文化：中國與世界》集刊〈開卷語〉的第二個要點：其提到的「三個最基本的要素與環節」涉及的「如何對待傳統文化（中學）」、「如何接受西方文化（西學）」，其實都是「百多年來（五四，上溯到 19 世紀末）文化發展史上『古今中西之爭』」的一個延續。⁴⁹ 而且也同五四前後的不同的文化評價與選擇的論爭一樣，1980 年代的「文化熱」中，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派別，彼此之間既有相通、相互糾纏，更有嚴重分歧與論爭。這都將成為我們在下文討論的重點，這裡不再多說。

需要說幾句的是，〈開卷語〉裡特意談及的「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這或許正是 1980 年代的文化熱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大的區別所在。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僅是同時傳入中國的眾多的西學之一，不成為單獨的「問題」。而 1980 年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並且是前文所討論的「黨文化」的法定的「指導思想」，儘管實際起指導作用的是黨的現任領導的思想，但也必須打著「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最新發展」的旗號，才能獲得合法性。這樣，馬克思主義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就獲得了一個壟斷地位，具有了某種文化專制的特質。這樣，它也就必然成為 1980 年代的思想解放、啟蒙運動挑戰的對象。如何對

⁴⁸ 甘陽：〈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八十年代文化意識》，頁 4。

⁴⁹ 湯一介：〈古今中西之爭與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文化的回顧與展望》，頁 75。

待馬克思主義就成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大問題。李澤厚曾經談到，在文革結束後，實際是有兩次思想文化浪潮的，一次是 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關於啟蒙、人道、人性的吶喊和論爭」，1980 年代中後期的「文化熱」是第二次。⁵⁰ 兩者間的最大區別，就在前者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論與人道主義思想作為理論依據的，這實際上是一次從馬克思主義內部去發掘思想解放與啟蒙的批判性資源的自覺努力；⁵¹ 而文化熱卻是自覺地從馬克思主義之外尋找思想、文化資源，以打破現實文化結構裡的馬克思主義的壟斷地位。但是，文化熱也並沒有因此簡單地否定馬克思主義，《文化：中國與世界》集刊〈開卷語〉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就是一個證明。下文的討論將表明，這些民間學術團體的大多數成員在成長過程中都不同程度上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這樣的影響有負面，也有正面。今天的反思固然是對曾經有過的束縛的掙脫，但也不是拋棄，而是像金觀濤所說的那樣，「站在比批判更高的層面」，進行創造性的轉換和重構。⁵² 這大概就是〈開卷語〉裡所說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吧。

〈開卷語〉的第三個層面，也是文化熱的最後歸結：「創造出當代中國文化的嶄新形態」。值得注意的是〈開卷語〉確立的目標：要在「把握世界文化的趨勢」前提下，「使中國的文化也走向世界」；

⁵⁰ 李澤厚：〈漫說「西體中用」〉，參看李澤厚：〈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 年），頁 311、199-203。

⁵¹ 參看錢理群：〈1978-1980 年間的理論風雲〉，《未竟之路：1980 年代民間思想研究筆記》（書稿尚未出版）。

⁵² 金觀濤：〈八十年代的一個宏大思想運動〉，收入馬國川編：《我與八十年代》，頁 174。

還有所設置的「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交融會合的遠景」，這就徹底走出了長期在中國思想文化界佔支配地位的，在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關係中的二元對立、一個吃掉一個的文化魔障，使當代中國文化有可能走向多元、和諧發展的健康之路。這本身就是文化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我們注意到的，還有〈開卷語〉中所說的「富有想像力的創造」，這表明，思想從重重束縛中解放出來，就煥發出了前所未有的想像力與創造力：這真是一個充滿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創造激情的時代。

三、多元選擇，眾聲喧嘩

在對 1980 年代中後期文化熱的時代背景與總體特徵，作了以上宏觀的描述和討論後，還需要深入到每一個民間學術團體內部，具體考察：這是怎樣的「一類人」，通過各個生命「個體」不同又相通的經驗和體驗，又通過怎樣的「途徑、方式」，聚集在一起？聚集以後，又提出了怎樣的共同又相異的「文化思想」，在眾聲喧嘩的文化熱中，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作出獨特的貢獻？我們將用歷史事實的回溯與歷史文本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呈現這一切。

(一) 金觀濤和《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

聚集在這裡的，是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四五」一代人。

金觀濤說，「如果沒有文革，或者文革推遲在十年以後發生，我都只可能是一個科學家，而不會走上思考歷史、人生和哲學的道路。」他回憶說，文革開始時，他正在北京大學化學系讀書，埋頭於科學報國的夢中，並因此作為「白專典型」受到了批判。從表面上看，在文革中，他屬於「挨整者」和「逍遙派」；但他卻認為自

己也參與了文革，只是用了特別的方式：文革的「一切事變在我的心中都變成了哲學」，這是一個文革的「旁觀者和思考者」。「從此，我開始了那長達二十年的哲學沉思——最初從陶醉在思想解放中的歡悅之情開始，接著就迎來了漫長的苦悶和徬徨時刻，它包括那一次又一次在非理性主義的黑暗中探索，最後重新去尋找光明和理性的歷程」。

金觀濤把他 1966-1970 五年間，在北大讀書與思考的精神歷程，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懷著「對思想解放的渴望」，到馬克思著作裡去尋找出路。金觀濤說，「文革給我第一次內心的震動是那些我從小就被社會和家庭灌輸的不可懷疑的信條的瓦解。從道德規範、理論體系，我所尊敬的人物一直到社會秩序，一切都變得不堪一擊，搖搖欲墜，原來那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也被褻瀆了」。金觀濤並沒有因此驚慌失措，而「從中領悟到懷疑一切的合理性」，並且以「這種懷疑帶來的獨立思考精神」，「用整個內心世界」走進馬克思主義著作裡。當他從馬克思的「辯證法」裡，懂得「世界從本質上是發展的，沒有一種事業、一種信條、一種規範可以萬古長青。一切處於永恆的流動、變化、產生和滅亡之中」，他感到自己一下子獲得了精神的解脫，「那種不怕神威、不怕天堂的雷霆的精神使我覺得振奮和解放」。在思想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金觀濤感到「馬克思的辯證法系統運用上直接繼承了黑格爾。於是就帶著尋找方法的焦慮心情，進入了黑格爾哲學體系」。但他真正陷入其中，卻產生了對「徹底辯證法」的「恐懼」：他發現，「只要用黑格爾的方法將辯證法貫徹到底，必然會得出一切都是虛無的結論」，他立即「意識到這種內在的方法論危機在中國近代史上已經引起和它將會引起多麼嚴重的後果」，他感到自己和這一代人「正站在懸崖邊上，前

後均無出路」。1968 年冬天，金觀濤在陷入「對哲學（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文革的合理性」產生懷疑的精神困惑時，他開始「由哲學向科學退隱」，從「20 世紀科學的前沿」尋求思想的出路，一遍又一遍地讀科學名著，開始攻數學、物理和外語。金觀濤說「他至今仍非常感激當時我那正確的直覺。那時候，科學革命對哲學和社會的挑戰遠未被中國學術界意識到」。這樣，他的思想就進入了第三個階段：「我感到科學之光慢慢在我心中出現，並開始擴大，我終於領悟到了一種和黑格爾式熱情的思想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我第一次感到了無形的力量，這就是科學理性。它不同於青年的熱情，而是一種深沉的自覺，一種寧靜而莊嚴的追求，它用建設性的清晰的思想充滿我的心」。

在有了這樣的新的覺醒以後，1970 年金觀濤從北大畢業被分配在家鄉杭州的一個塑膠廠勞動。這時，文革已經進入它的後期，金觀濤發現「幾年來狂熱的革命運動已經使整個民族疲倦了」，「整個民族精神開始陷於酣睡」。這反過來激發起金觀濤這樣的已經有了反思的青年人的歷史責任感。金觀濤說這是一種「歷史意識的覺醒」。他和他的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同學，也包括他的終身伴侶劉青峰，開始通過書信交流思想，特別是對重要理論著作讀後的人生啟悟。劉青峰將和金觀濤以及其它朋友的通信創作整理成了小說《公開的情書》，用油印稿在朋友間悄悄流傳。這樣的以通信或其他方式（例如彼此串聯）形成的青年地下讀書圈子，在文革後期是遍佈全國的，以後的研究者將其命名為「民間思想村落」。身處在這樣的具有明顯異端性的民間思想村落裡，金觀濤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變化。他說 1974 年後，自己「開始感覺到一種新的東西在我的內心萌發，而且越來越強大。這就是，我的人生目標由青年時代追求宇

宙的真理變成了追求中華民族的真理」。於是，他開始思考，整個民族，以及自己「這一代人」「要到哪裡去？」而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我們又究竟是從哪裡來的？」由此產生的是思考與研究的自覺意識和衝動：「我們應該比前人站在更高的高度上來認識中華民族的歷史，特別收中華民族近百年來走過的道路」。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與思想背景下，金觀濤在劉青峰支援下，開始了對「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這一問題的研究，以此作為「進一步探討的起點」，並且決定「用屬於我自己的『控制論』」作為基本的研究方法。大概在 1974 年金觀濤和劉青峰已經把有關中國歷史的思考寫成一份約七萬字的提綱，實際上是一份備忘錄，以後發表的有關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的論文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金觀濤回憶說，到了 1975、1976 年間，「我們同代人紛紛估計中國的政局即將大動盪」，而他們則感到「一種意想不到的結局即將到來，中華民族即將開始在她近代史上一個史無前例的創造時代」，而他們自己已經為這樣的時代的到來，作好了精神、思想、理論上的準備。⁵³

以上比較詳盡地梳理了金觀濤在文革期間思想變化、成長過程，意在說明，在文革時期，特別是後期的中國民間社會，主要在年輕一代中，已經悄悄開始了對中國社會問題，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問題，以及文革的問題的反思和討論，不僅為文革後、發生在 1980 年代的中國改革作了一定精神、思想、理論的準備（儘管十分有限），而且也在這一過程中，培育了以後民間改革的領軍人物與骨幹力量。我們已有討論的陳一諮、陳子明，以及這裡討論的金觀

⁵³ 金觀濤：〈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學〉，《我的哲學探討》，頁 3、5-7、9、12、15-17、19、21、25、29、30、35、36、41。參看金觀濤：〈八十年代的一個宏大的思想運動〉，收入馬國川編：《我與八十年代》，頁 164。

濤，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們分別在 1980 年代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思想啟蒙、文化反思運動中都代表民間力量發揮了獨特作用，是絕非偶然的。而和他們一起並肩戰鬥的「四五」這一代人，也都有著不同程度的思想，以至理論上的準備。在我們這裡討論的民間思想學術團體裡，在推動 1980 年代思想啟蒙、文化反思運動上，金觀濤和他的《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或許是最有準備的。這也是其特點與特殊作用吧。

正因為早有準備，因此，文革結束，他們就立刻抓住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首先行動起來。金觀濤在 1976 年就在《物理》雜誌上發表論量子力學的科學論文，1977 年冬參加全國科學技術規劃大會，被於光遠選中，於 1978 年調往北京，參與籌備成立《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擔任編輯。1980 年初，同時在《十月》和《貴陽師範學院學報》發表了小說《公開的情書》和論文〈歷史的沉思：中國封建社會結構及其長期延續原因的探討〉，把他們文革民間思想村落裡的思考成果公之於世，立刻以其思想的解放與新銳而在文壇和學術界上產生了很大影響。也就在 1980 年初，金觀濤、劉青峰參加了由北京社會科學研究所和國務院研究室的青年社會學者林春、李銀河牽頭的《青年文稿》叢刊的創辦。林春和李銀河因為在 1978 年就在《中國青年》上發表〈要大大發揚民主，大大發揚加強法制〉的長文，較早提出「要使人民的一切民主權利精確地、完備地記載在各種法律裡，並且要使它們具有任何人不得違反的法律效力」，而產生很大影響。現在創辦《青年文稿》，就是要以書代刊，辦一個青年學者自己的叢刊，可以說，這是初出茅廬的青年學者跨學科、跨單位的組織起來，創建民間學術的一次嘗試。參與者還有經濟學者王小強，王曉魯，和政治學者李湘魯等。金觀濤也很看重

《青年文稿》，他後來在回顧這段歷史時，就以《從《青年文稿》到《河殤》》為題，他是把《青年文稿》叢刊的創辦，看作是 1980 年代民間學術文化團體的一個濫觴的。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的《青年文稿》叢刊，只有一本即《歷史的沉思》，是三聯書店出版的。⁵⁴ 研究者說它「包含了《走向未來》叢書的原始記憶」。這不僅是因為它收入了金觀濤、劉青峰的《歷史的沉思：中國封建社會結構及其長期延續原因的探討》，所署書名也是由此而來；更是因為書中的幾篇重頭文章即已提出了《走向未來叢書》的一些基本命題。如李湘魯的〈論文理兩科方法論的共同基礎〉就提出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梁中鋒的〈馬克思主義的物件和作為物件的馬克思主義〉則提出「科學」的本質即批判精神，而批判精神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在唯物辯證法面前，任何事物都必須接受核對總和批判」，「唯有馬克思主義者才有氣魄公然宣佈：馬克思主義沒有什麼原則不可以放棄，如果它與事實相違背；馬克思主義也沒有什麼原則可以放棄，如果它與事實相符合。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只有本著科學的態度，我們才能找到馬克思主義；只有始終不渝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我們才可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⁵⁵：這都有明顯的現實針對性，是為新時期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啟蒙開路的。正因為如此，《青年文稿》於 1980 年 12 月一出，即引起軒然大波，中宣部認定為非

⁵⁴ 李銀河在她的回憶裡說，出了兩本，都是人民出版社出的，恐有誤。見李銀河：〈真正的變化要開始了〉，收入馬國川編：《我與八十年代》，頁 184。

⁵⁵ 李湘魯：〈論文理兩科方法論的共同基礎〉與梁中鋒：〈馬克思主義的物件和作為物件的馬克思主義〉，均收入《青年文稿：歷史的沉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 年）。轉引自皮炯勳，頁 6-7。

法出版物，嚴令禁止。這也非偶然，因為正是在 1980 年 12 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風雲突變，鄧小平接受陳雲意見，決定經濟上實行進一步調整的方針，政治上加強控制，以防範潛在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並於 1981 年 2 月，由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可以說《青年文稿》正碰到槍口上了。從此，也杜絕了民間政治、思想、文化、學術在體制外發展的可能性，

這樣，金觀濤們只有在體制邊緣尋找出路。如我們在〈《民間思想庫》：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團隊〉一文所討論過的那樣，首先要找掛靠單位。金觀濤設想，繼《青年文稿》之後，再編一套大型叢書，即《走向未來》叢書。他經人介紹，找到的是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他後來回憶說，研究所負責人鍾沛璋一見面就問：「為什麼要做叢書？」他回答說，「就是想辦一套啟蒙性的思想性叢書」。本是胡耀邦部下的鍾沛璋「一聽就明白，一拍即合，這就成了」。⁵⁶ 其實，陳子明的團隊後來找的也是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我說過，這是「一二九」一代與「四五」一代在 1980 年代的成功合作，這在歷史上是可以記下一筆的。⁵⁷

但他們還需要找具體的承擔單位，即與出版社合作，這就頗費周折。據說最初的合作對象是湖南人民出版社。他們剛出版了一套《走向世界》叢書，影響很大，就想再出一套針對年輕人的知識性和修養性的叢書；金觀濤們卻一心要出思想性、啟蒙性的叢書，出

⁵⁶ 金觀濤：〈八十年代的一個宏大的思想運動〉，收入馬國川編：《我與八十年代》，頁 170。

⁵⁷ 參看錢理群：〈《民間思想庫》：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團隊（上）〉，《未竟之路：1980 年代民間思想研究筆記》（書稿尚未出版）。

版社就頗為猶豫：不僅因為金觀濤們的想法，很難納入青年知識讀物系列，更「不知道如何納入現實（出版）體制」。⁵⁸ 這就需要等待轉機。

而轉機事實上已經悄悄來臨：這就是 1980 年代初開始的出版和圖書發行體制的改革。首先是在 1982 年全國圖書發行體制改革座談會上，由出版總署負責人確認了圖書所具有的「精神產品」和「商品」雙重屬性，因此，要注意「社會效果」和「經濟效果」，同時允許出版社「實行企業管理」。中宣部批准的《關於圖書發行體制改革問題的報告》裡，又提出要「在全國組成一個以國營新華書店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多條流通管道，多種購銷形式，少流轉環節的圖書發行網，使貨暢其流，書盡其用」。1983 年 6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確立了出版工作「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根本方針」，卻不再強調出版工作「為政治服務」；出版總署負責人在直屬領導幹部會議講話裡，把出版物分為「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提供穩定知識」、「作為文化積累」、「作為工具查用」、「作為科學研究用」、「豐富文化生活」等類別，明確提出，「書有各種門類，要求和作用不同，不能都像報刊那樣去直接配合當前政治任務」，「政治宣傳可以輿論一律，學術理論著作則要百家爭鳴」。同時還傳達了主管文教宣傳的胡喬木的話：「我們不能把人類歷史的文學藝術——除掉我們所要剔除的那一部分糟粕以外——都貼上『為政治服務』的標籤，那是做不到的」。〈關於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還明確規定：「出版工作要在統一領導下，發揮中央和地方出版部門的積極性，

⁵⁸ 金觀濤：〈八十年代的一個宏大的思想運動〉，收入馬國川編：《我與八十年代》，頁 169。

地方出版社立足本地，面向全國」。1984 年召開的地方出版工作會議上又進一步提出，要改進國家對出版社的管理，擴大出版社自主權，由單純生產型向生產經營型轉變，建立以提高圖書品質為中心的各種責任制，建立生產精神產品的激勵機制，促進多出好書。⁵⁹ 以上從 1982-1984 年連續出臺的出版、圖書發行體制改革的新思路，新政策，新舉措：解除「為政治服務」的緊箍咒；確立出版社實行企業化管理的原則和建立相應機制；擴大出版社自主權；強調發揮地方出版部門積極性，並確立「立足本地，面向全國」的方針，等等，這都無疑意味著在文革中面臨滅絕的邊緣，⁶⁰ 直到 1980 年初還處於完全不能滿足民眾閱讀渴望的「書荒」的尷尬中的中國出版界的一次空前的大解放，給出版社帶來了更多的自由與機遇，特別是地方出版社更是獲得一個前所未有的在全國範圍尋找作者資源，並在全國發行的發展空間。這同時也給民間的參與提供了某種可能性。

金觀濤和他的朋友正是敏銳地抓住了出版和圖書發行體制改革造成的空隙，成功地實現了民間學術團體與地方出版社的聯盟。這回他找到的合作者是四川人民出版社，這裡有人事關係的因素：劉青峰上的叔叔劉茂才當時是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⁶¹ 更有四川人民

⁵⁹ 以上關於 1982-1984 年間中國出版、圖書發行體制改革的講話、決定，均轉引自陳麗芳，頁 11-13。

⁶⁰ 這裡有一組資料：1959 年全國出版圖書 27000 種，到 1967 年就下降到 3000 種；1966-1976 文革十年出版圖書僅有 8000 種，平均每年 800 種；出版刊物 1957-1965 年有 600 種左右，到 1960 年代後期，下降到 20 種左右。轉引自皮炯勳，頁 5。

⁶¹ 陳子明、徐友漁：〈關於八十年代思想派別與《二十世紀文庫》的通信〉，《陳子明文集》第 2 卷，頁 7。參看趙和平：〈張黎群和《走向未來》叢書〉，

出版社自身的因素：黨和國家的新政策極大地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也在嘗試出版改革的新路，他們提出的「做出版家而不做出版商」的新理念和金觀濤們的啟蒙理念是相通的，再加上四川人民出版社是一個老出版社，擁有有戰略眼光的社領導，有理想、有經驗的編輯隊伍，也有相當的經濟實力。這樣，在青少年研究所領導張黎群的牽線下，四川人民出版社與金觀濤們也是「一拍即合」。（陳麗芳，頁 15）他們最後確定的合作方式，是由金觀濤們組成「社外編委會」，在選題策劃、約稿、審稿、書稿的撰寫、修改、完善上，擁有很大的自主權；出版社擁有終審權，並組織專門的編輯室，負責具體的編務，以及出版發行工作，雙方共同負責叢書的宣傳與學術交流活動。這樣一個國家出版社與民間社外編委會互動的模式，也就在體制的邊緣地帶，為 1980 年代的民間思想、文化、學術的發展開創了一個新的空間。此後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二十世紀文庫》編委會等民間學術團體，走的都是這條路。應該說，這本身即是《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的一個重要貢獻。⁶²

1983 年 6 月，《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宣佈成立，並撰寫了〈編者獻辭〉；1983 年 11 月、12 月出版了第一批叢書，計有《人的發現——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李平曄著）、《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於人類困境的研究報告》（李寶恆譯）、《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灌耕編譯）、《語言學和現代科學》（陳明

《河南教育（高校版）》2005 年第 2 期（2005 年 6 月），頁 54-55。

⁶² 陳子明在總結 1980 年代「文化思想派別」時，特地談到了《走向未來》群體「在前面趟路的作用」。他說，「由於《走向未來》群體率先結成社外編委會，我才能和其他人隨後組建一系列編委會」。見陳子明：〈關於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別與《二十世紀文庫》的通信〉，《陳子明文集（第 2 卷）》，頁 7。

遠編著)、《在歷史的表像背後——對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的探索》(金觀濤)等。人們首先注意的,是其裝幀設計的特別:「薄薄的小書,黑白色樸素的封面,極具衝擊力的抽象圖案」。叢書採用長三十二開,開本較小,每本字數限制在十萬字左右;封面左邊是由點、線、面(後又採用人物形象上各種抽象和變形)構成的現代抽象派圖案,右邊是書名,書名上角是燙金的「走向未來」叢書標誌。書裡的插圖則有漫畫卡通、立體插畫、單線條畫、簡筆劃、素描畫、版畫、抽象畫等多種形式,體現了「求新」的編輯原則,即追求「新知識,新思想,新方法,新設計」,在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和出版界引起了出乎預料的巨大反響(參看陳麗芳,頁55-57):似乎象徵著一個思想、文化、出版的新時代真的到來了。

當然,更引人注目的,還是《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的組成:主編包遵信,以後又擔任了1985年成立的中國文化書院的學術導師;副主編金觀濤、唐若昕⁶³,金觀濤應是叢書編委會的靈魂與實際主持人,1987年就正式出任主編。編委中的王岐山、朱嘉明、翁永曦、黃江南是因向陳雲上條陳而名噪一時的「四君子」;何維凌、王小強、王曉魯都是當時已頗有影響的陳一諮為首的農村發展問題研究小組的主要骨幹;嚴家其則是被稱為「理論務虛派」中年青一代的代表;以後陸續補充的編委王焱、劉東等都是「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的骨幹和成員。

在1985年又聘任了一批顧問,計有嚴濟慈、錢三強、侯外廬、陳翰伯、杜潤生、張黎群、鐘沛璋等,1987年金觀濤任主編後,又增補了包遵信、陳一諮。因此可以說,1980年代的最重要民間組織

⁶³ 唐若昕,當時是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辦公室主任,是他將金觀濤等人介紹給青少年研究所的,以後成了他們之間的連絡人。

都有代表人物聚集在《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並且得到了重量級的老學者和「一二九」一代的老幹部的支持。這當然不是偶然的。最初金觀濤在向青少年研究所所長張黎群介紹他籌畫中的《走向未來》叢書時，就說了三點意思：一是當下中國「還需要與『五四』相似的知識份子運動」；二是「一個時代的原動力和變化總是來自於年輕人，而且當時的年輕人都熱烈的期待著新變化的機會」；三是「走向未來」知識群體在知識層面是革新式的，但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傾向性，他們將努力不給支持者帶來政治負擔。⁶⁴

顯然，金觀濤的雄心，是要發動一場以年輕人為主體的思想啟蒙運動。因此，他在組建叢書隊伍時，就確定一條原則：以時已四十五歲的主編包遵信為最高年限，以二、三、四十歲的年輕人為主體；更重要的是，是要盡可能地將北京地區青年精英的各路人馬聚集在一起，使所有「期待著新變化」的年輕人在老學者、老幹部支持與保護下，都有一個發展的「機會」。同時，他又吸取了《青年文稿》最後被宣佈非法的經驗，儘量淡化叢書的政治傾向性，這也是叢書編委會裡唯一沒有吸收的民間思想群體就是直接參與西單民主牆和民刊運動的陳子明、王軍濤團隊的原因。⁶⁵但金觀濤這樣的廣開大門的戰略，也會造成各路人馬各有想法，儘管都志在改革，但在改革路徑上卻各有選擇，即使同樣主張思想啟蒙，在思想、文化的觀念上也大有分歧。這就決定了《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成員最終仍要各奔東西。但當他們最初聚合時，還是有一個大體的共識

⁶⁴ 見金觀濤、陳方正：《從《青年文稿》到《河殤》》，轉引自皮炯勳，頁 8。

⁶⁵ 如前文所述，陳子明的團隊後來還是以《二十世紀文庫》編委會的方式，參與了「文化熱」的推動。

的。⁶⁶

這主要體現在叢書的〈編者獻辭〉，這也是叢書出版第一批書公開亮相時，人們的一個關注點。首先是對所處時代的特點總體把握和體認：「我們的時代是不尋常的。二十世紀科學技術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生活和生存方式。人們迫切地感到，必須嚴肅地對待一個富有挑戰性的、千變萬化的未來。正是在這種歷史關頭，中華民族開始了自己悠久歷史中又一個真正的復興」。——這裡，把「科學技術革命」所帶來的「人類社會生活和生存方式」的迅速而深刻變化，作為新時代的主要特徵和主要挑戰，是非常獨到而又超前的。如前所述，金觀濤是在文革後期醒悟到這一點的，他說「那時候，科學革命對哲學和社會的挑戰遠沒有被中國學術界意識到」。⁶⁷ 應該說，即使在 1980 年代思想解放和開放的時期，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自覺意識到這一點的，也不多見，在民間思想界幾乎是「獨此一家」，甚至還有將其簡單稱為「科學主義」而加以排斥的。似乎直到今天，到了 21 世紀第一、二個十年，人們才開始意識到新的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巨大挑戰，距離我們這裡討論的《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編者獻辭〉已經三十多年，這是不能不讓人感慨系之的：或許可以說，對科技革命挑戰性的自覺意識和回應，這本身就是金觀濤代表的《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的一個獨特的重要貢獻。

值得注意的是，金觀濤們是在這樣的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來

⁶⁶ 以上關於從《青年文稿》到《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組成的歷史回顧與敘述，所參考的文章，除已經分別注釋的外，還有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頁 460-461。

⁶⁷ 金觀濤：〈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學〉，《我的哲學探索》，頁 19。

思考、尋求「中華民族真正復興」的道路的。在他們看來，中國要改變與世界上最新科學技術發展大大脫節與落後的狀況，不僅要吸取最新科學技術成果，而且要在文化上吸取建立在現代科技發展基礎上的新的科學世界觀與科學方法，由此而形成了他們實現「文化現代化」的獨立選擇。〈編者獻辭〉引述了馬克思的一段名言：「思想的閃光一旦真正射入這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進而提出：「今天，照亮我們民族的思想閃電，就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精神和我們民族優秀傳統的結合，以及由此開始的創新」。這裡的關鍵是「科學精神」：有了科學精神，才能科學地理解和對待在中國現實生活裡一直佔主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並科學地理解和對待同樣不可回避的民族傳統文化，最終實現三者的「結合」。

更重要的是，金觀濤們也由此而確立了自己的努力目標與位置，即「力圖從世界觀高度把握當代科學的最高成就和特點」，向正在進行改革的中國「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介紹「通過精選、咀嚼、消化了的各門學科的知識」，「特別注重於科學的思想方法和新興的邊緣學科的介紹和應用」，以「推動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結合」。

這裡強調的「科學精神」、「科學世界觀」、「科學的思想方法」是最能顯示《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的現代文化觀的，以後的評論者也是以此來評價他們。如徐友漁即指出，「科學的世界觀和科學的方法論有一套新的東西，這套東西是建立在上個世紀（指 20 世紀）科學發展的最新潮流之上的，所以他們（金觀濤、劉青峰）認為，應該用這套東西來解釋歷史，解釋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而不要以那些陳詞濫調，那些老教條來解釋。他們想給中國提

供的是一個基於最新自然科學成果上的世界觀與歷史觀」。⁶⁸ 陳子明據此將《走向未來》編委會稱為「新方法論派」。⁶⁹ 陳來則肯定金觀濤等「提倡科學精神」，「把二次大戰後發展起來的系統論（及控制論、資訊理論）大膽地應用於中國史領域」，「不啻是對傳統的中國史學理論和教條化的馬克思史學方法一大衝擊，顯示出一個新的方向，開闢了如何轉化自然科學方法為社會科學方法的廣闊領域」。同時又批評其「以代表自然科學『佔領』歷史等人文領域的姿態，表現出強烈的科學主義的心態」。⁷⁰ 更年輕的研究者則「將《走向未來》叢書的精髓看作『科學與理性主體』的重建」，強調「對『走向未來』知識群體來說，『科學』概念正是組成知識空間的中心概念，他們借用『科學』這一概念在各個社會領域的功能，來探索和建設獨立自由的知識空間」，進而「重新建設與以往不同的文化空間」，在金觀濤為代表的「走向未來」群體這裡，「科學」與「理性」不僅是一個方法論，更是一種文化觀，啟蒙觀，是對時代提出的思想啟蒙、文化反思問題的獨特回應。（皮垌勳，頁 24-25）

我們的討論或許還可以再深入一步：金觀濤和他的「走向未來」群體，為什麼要在 1980 年代提出「科學」、「理性」重建的問題？劉再復曾經說過，這一年代學術的特點，是面對精神大困惑，提出問題，進入問題，具有歷史的針對性，這是「面對生命的困惑，提

⁶⁸ 徐友漁：《中國三十年個派社會思潮》（2009 年 2 月 28 日在三味書屋的演講）。

⁶⁹ 陳子明、徐友漁：〈關於八十年代思想派別與《二十世紀文庫》的通信〉，《陳子明文集（第 2 卷）》，頁 3。

⁷⁰ 陳來：〈思想出路的三動向〉，《《文化：中國與世界》三十年（1986-2016）》，頁 109、110。

出各種扣問的年代」。⁷¹ 也有學者這樣評價金觀濤：「作為一名承擔時代思想課題的知識份子，他沒有退卻，面對時代的最深層面的桎梏，選擇挑戰它，修正它」。（皮垌勳，頁 101）那麼，金觀濤們所面對的，究竟是怎樣的「時代的最深層次的桎梏」，他們有著怎樣的「生命的困惑」？他們提出的「科學」、「理性」更有怎樣的「歷史針對性」？這就需要重新進入 1980 年代具體的歷史情境中。

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金觀濤的一個論述：「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人們只看到其中對科學的信仰，並把它變成一種崇拜，忽略其產生的懷疑批判的理性精神」，「馬克思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種建立在『科學主義』之上的意識形態」。⁷²

對此，我們可以作三個方面的討論。

其一，金觀濤對剛剛過去的文革歷史的反思，對所面對的現實問題的思考，集中在對「馬克思主義」和其「傳入中國」以後歷史的認識上，是抓住了一個要害的：建國以後，中國思想文化的最大特點，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國家意識形態；文革中更發展為以被稱作「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思想「指導一切，改造一切，佔領一切」。以後金觀濤還有這樣的概括：「1949 年大陸建立的社會是毛澤東思想和社會組織的一體化」。⁷³ 因此，要對文革進行真正深入的反思，就必須對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歷史，進行

⁷¹ 劉再復：〈那是富有活力的年代〉，收入馬國川編：《我與八十年代》，頁 124。

⁷² 金觀濤、劉青峰：《新十日談》（香港：天地圖書，1990），頁 41。轉引自皮垌勳，頁 42。

⁷³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4。

根本性的扣問；而文革結束後，馬克思主義依然是佔統治地位的國家意識形態，人們要獲得思想的真正解放，也必須對馬克思主義自身有一個科學的認識。而對金觀濤這樣的在共和國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來說，馬克思主義是他們最早的也幾乎是唯一的啟蒙思想資源；現在，他們要進行自我反思，也必須從重新認識和反思馬克思主義開始。

其二，有意思的是，金觀濤們的反思，並沒有簡單否定馬克思主義，而是首先肯定馬克思本身具有的「懷疑、批判的理性精神」。而且這並非一種策略，而完全出於內心的體認。這是我們在前文的敘述裡已經提到的，金觀濤在文革初正是首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革命性的原理」：「世界從本質上是發展的，沒有一種事業、一種信條、一種規範可以萬古長存」。

領悟到「懷疑一切」的合理性，從而開始獲得獨立思考精神，並逐漸成為習慣的。⁷⁴ 這樣的認識並不只屬於金觀濤一人，在文革中凡是讀馬克思經典著作的年輕人，都熟知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裡對馬克思哲學的本質的經典論述：「這種辯證哲學推翻了一切關於最終的絕對真理和與之相應的人類的絕對狀態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絕對的、神聖的東西」。問題是，這樣的本質上的革命性與批判性被逐漸遮蔽，曲解，導致嚴重後果。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金觀濤和他的《走向未來》群體在 1980 年代反思馬克思主義，就是要恢復馬克思主義本有的批判性傳統。

其三，當然更重要的是，要正視「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逐漸「把它變成一種崇拜」的歷史與現實，認真總結其經驗教訓。

⁷⁴ 金觀濤：〈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學〉，《我的哲學探索》，頁 6。

研究者指出，其始作俑者正是恩格斯：當他對馬克思思想進行「再解讀」，提出「科學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宣佈其為「唯一的科學」，是「客觀真理」的體現；而所謂的「客觀真理」是「獨立於人類的思考而存在，並且人類只能或者一定要遵循這一『客觀真理』，違背『客觀真理』的一切思想都被認為是錯誤的」，這就把馬克思本所具有的一定的「科學性」，發展成為「科學主義」。這樣的「一元化馬克思主義」，就成了金觀濤所說的「建立在『科學主義』基礎上的意識形態」。（皮垌勳，頁 48）劉青峰對這樣的被「科學主義」化的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尖銳批判。她指出，「科學主義作為一元論的思維模式，它具有文化霸權的性格；第二，既然科學主義是馬列主義的基礎，那麼，馬列主義成為大陸主導意識形態後，科學主義也應對其壓制思想自由負責」。在對「科學」與「科學主義」作了這樣的理論的區分以後，劉青峰指出，1980 年代他們要重建「科學」，也有研究者認為是「科學主義」的再度興起，其實二者之間是有原則的區分的：他們要重建的「科學」，恰恰是「作為反對文化霸權的工具，表現出一種反對正統意識形態使思想趨於多元開放的功能」。⁷⁵

如前文所說，這樣的「一元化馬克思主義」在文革中就發展成為自稱「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思想的思想壟斷和全面專政。經過文革十年的苦心經營，到文革結束時，毛澤東思想的精神統治已經滲透到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生活，以至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成了實實在在的「時代最深層次的桎梏」。這是金觀濤們要發動新的思想解放和啟蒙運

⁷⁵ 劉青峰：〈二十世紀中國科學主義的兩次興起〉，《二十一世紀》1991 年 4 月號（1991 年 4 月），頁 33。

動，首先必須面對，必須挑戰的。

金觀濤們的選擇，是要引入西方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實現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以此作為突破口。但要做到這一點，也必須首先打破一元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桎梏。金觀濤所在的《自然辯證法通訊》等雜誌在 1979-1986 年間就有過一次專門的論爭。問題的引發依然是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裡提出所謂「馬克思主義的自然哲學體系」，即「凌駕於科學之上的自然哲學」，宣佈「自然界與精神的統一」，「思維規律與自然規律的一致」，試圖以所謂「自然辯證法」來統領自然科學研究。在中國，要用馬克思哲學體系來改造自然科學的，是毛澤東。他在文革前夕的 1964 年 8 月〈和科學家的談話〉和〈接見北京科學討論會的各國代表團的講話〉裡，借日本物理學家阪田提出的一個物理模式大做文章，提出要建立一個「包羅自然科學體系在內的新的哲學體系」，並指定專人組織對自然辯證法的研究。⁷⁶到了文革期間，更是「在自然辯證法名義下打棍子」，「科學被認為是社會意識，具有階級性，來自西方的科學理論一再被扣上『資產階級』的帽子而遭到批判」。現在，金觀濤們要做的，就是從事實上構成了「一元化馬克思主義」有機組成的「自然辯證法模式裡脫離」，也即擺脫「諸如『歷史發展規律』、『客觀真理』等的先驗邏輯」，回到「經驗事實」的邏輯，「以重新建設獨立的自然科學話語空間」。（皮珂勳，頁 48-54）

值得注意的是，金觀濤和他的「走向未來」群體，在挑戰一元化馬克思主義的桎梏時，並沒有就此走向「西方中心主義」。金觀濤把問題看得很清楚：在追求「現代化」時，「人們往往不得不用

⁷⁶ 參看錢理群：〈1969-1974：顧准的思考（下）〉，《1949-1976：歲月滄桑》（香港：香港城市大學，2017），頁 983-984。

天賦人權和追溯這些制度的價值的取向的起源，來論證它的合理。這種論證會帶來一種困惑，這就似乎把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因為它們都是從西方最先興起的，並在西方文化中最早實現的」；但這恰恰是應該警惕的，因為「今天，西方文化中心已被破除，人們公認文化有它多元的合理性」。⁷⁷ 金觀濤看得更清楚，奉行西方中心論實際上就是要「毫無保留地重返資本主義文明」。這是更需要警惕的：在批判「中國式社會主義」，挑戰一元化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又喪失了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批判意識，陷入了一元化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陷阱。他和「走向未來」群體所要做的，是「超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極對立」，挑戰一切一元文化主義，做到真正的「脫一元化」：他們所追求的「未來的社會是一個在科學精神籠罩下的更理性和科學的社會，今天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只是通往它的過渡階段」。⁷⁸

這明確無誤地表明，金觀濤和《走向未來》叢書所要重建的「科學」和「理性」，其核心就是論者所說的「永恆的批判性」：「一切『傳統』，一切『我』之前存在的東西，都必須在『理性法庭』上接受審判」。⁷⁹ 金觀濤將其稱為「求實的懷疑精神」，並且補充說，這樣的永遠的批判與懷疑是一種「理性反思的能力」；所謂「反思」就是「在提倡任何一種價值時，都讓懷疑和批判意識與其共存」。⁸⁰

⁷⁷ 金觀濤、劉青峰：《新十日談》，頁 350。轉引自皮炯勳，頁 43。

⁷⁸ 金觀濤、劉青峰：《新十日談》，頁 354。轉引自皮炯勳，頁 44。參看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頁 18。

⁷⁹ 汪丁丁：〈啟蒙死了，啟蒙萬歲！——評汪暉關於「中國問題」的敘說〉，《戰略與管理》1999 年 1 期（1999 年 2 月）。轉引自皮炯勳，頁 32。

⁸⁰ 金觀濤：〈八十年代的一個宏大的思想運動〉，收入馬國川編：《我與八十年代》，頁 175。

在金觀濤看來，「這種不斷懷疑、不斷對自己的觀察進行再觀察、對自己的思想進行再思想的自我批判與自我超越意識是人類最寶貴的能力」。⁸¹ 金觀濤們因此提倡創造「寬容」的「理性化」的「開放社會」環境：「我們必須對不同的理論加以寬容，必須讓人大無畏地思想，必須建立一個容忍毫不留情的批評的環境，來淘汰那些經不起考驗的理論。正是科學告訴我們，為了認識真理，重要的不是一下子提出一個十全十美、不再接受批判和檢驗的理論。恰恰相反，這樣的理論一定導致思想的停滯，重要的是要在理論結構上有自我糾錯的機制」。⁸²

我們再討論第二個層面的問題：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鬥爭哲學的反思。於是注意到金觀濤的這一論述：「1949 年〈矛盾論〉演化為一種依靠對立面的鬥爭來導致事物性質改變的理論。顯然哲學觀由偏重平衡向反對中庸和打破平衡，其內在原因是毛澤東急於改變中國現狀，去建立一個超越直觀理性的理想社會。哲學觀由理性向非理性典型事例，表現在『一分為二』和『合二為一』的爭論之上」。⁸³ 儘管金觀濤對毛澤東強調鬥爭以打破平衡的初衷（即「急於改變中國現狀」）有一種同情的理解，但他一點也不回避其嚴重性。所謂「『一分為二』和『合二為一』的爭論，其實是在文革前毛澤東組織的對被稱為哲學界「黨內資產階級代表」的楊獻珍的大批判，他的主要罪狀就是曾經對毛澤東的「一分為二論」提出質疑。而這場大批判顯然是為文革製造輿論的；在文革中，毛澤東

⁸¹ 見林同奇：《人文尋求錄》（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頁 185-186。轉引自皮炯勳，頁 100。

⁸² 金觀濤、劉青峰：《新十日談》，頁 354。轉引自皮炯勳，頁 43-44。

⁸³ 金觀濤、劉青峰：《新十日談》，頁 323-324。轉引自皮炯勳，頁 99。

的「一分為二」思想轉化為億萬人的「革命實踐」，就成了把所有的群眾和幹部按照他們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一分為二」為「革命」與「反革命」兩大對立面，進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這樣的「鬥爭哲學」就成了文革暴力的指導思想，哲學基礎。文革結束後，人們在面對文革造成的群眾分裂、社會動盪、無辜者慘遭血腥鎮壓等等嚴重後果時，都會追問到毛澤東的「一分為二」鬥爭哲學的理論失誤。因此，早在 1979 年，哲學界就有過一次質疑；批判者尖銳指出，「『一分為二』的思維原理「片面地強調了鬥爭性的作用，而完全否定了同一性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實際上是把分化、分裂看作發展的唯一形式」，「只能導致不斷的鬥爭狀態」，這是引發文革的重要思想原因。⁸⁴

金觀濤也參與了對鬥爭哲學的質疑和反思，他強調的是其「非理性」的特徵，並把它看作毛澤東思想與時代的「非理性」的一個「典型事例」。這是自有一種深刻性的。他的著眼點，在「一分為二」的鬥爭哲學對人們的思維、行為方式的影響。這就是人們經常提到的「非此即彼，非對即錯，非是即非，非白即黑，非革命即反革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二元對立思維，「直線的、獨斷的、命令式的、一個吃掉一個」的「單向度的思維」。⁸⁵ 應該說，經過文革時期每一個中國人都卷人其中、無一倖免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洗禮，這樣的二元對立的、單向度的非理性思維已經滲透到中國國民思維裡，成為新的國民性，以至在沒有經歷文革的中國年

⁸⁴ 參看羅照：〈「一分為二」不能完整地表述對立統一學說〉，《哲學研究》1979 年 8 期（1979 年 8 月）；王正萍：〈如何正確理解「一分為二」〉，《哲學研究》1979 年 9 期（1979 年 9 月）。轉引自皮炯勳，頁 83-94。

⁸⁵ 劉再復：〈那是富有活力的年代〉，馬國川編：《我與八十年代》，頁 140。

輕一代的思維、行為方式裡，都隱約可見這樣的鬥爭哲學思維的陰影，這已經構成了我們這裡著重討論的「時代最深層次的桎梏」，這正是金觀濤首先要挑戰的，這也是金觀濤和「走向未來」群體提出「理性重建」的重要背景與原因。在這方面他們是高度自覺的。金觀濤明確表示，他「從來不否認非理性主義哲學（或反理性主義）的合理性」，但「在一個理性已經沉淪（指文革時期——錢注），人們在一片精神廢墟中無所適從的時代（指文革後——錢注），非理性主義可以輕而易舉地贏得人心，所以它經常是膚淺的，甚至是可怕的」；「我們這一代曾親身經歷了過去理性大廈倒塌的痛苦；沒有別的人比我們這一代人更能理解理性需要重建！」⁸⁶

金觀濤因此也給自己提出「重建理性哲學」的任務，他在 1985-1987 年間，連續推出《發展的哲學》、《整體的哲學》和《人的哲學》就是這樣的努力。⁸⁷ 研究者則注意到，金觀濤的哲學是建立系統論基礎上的，他的意圖是要把「矛盾的發生轉變為『不確定性』」，「把分析的重點從『矛盾的鬥爭和消失』轉移到『系統的演化』」，顯然是把系統論「看作是一個消解矛盾鬥爭性的理論體系」（皮炯勳，頁 94-95）：這都可以看作是他擺脫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對幾代中國人的思想桎梏的一個嘗試。

1988 年 5 月《走向未來》叢書最後一批圖書裡，有一本《理性主義》（陳宜良著），也很引人注目：它不僅梳理了從文藝復興運動到 20 世紀存在主義哲學的西方理性主義發展的歷史過程，並且考察了理性主義的局限性及危險性：「啟蒙思想希望用『理性』來取代上帝，以自身的權威來取代神的權威」，「起維護道德和保護

⁸⁶ 金觀濤：〈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學〉，《我的哲學探索》，頁 46。

⁸⁷ 金觀濤：〈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學〉，《我的哲學探索》，頁 169。

進步兩種功能，只會使自己陷入二律背反。理性在抽去了上帝腳下的基石的同時，也抽去了自己腳下的基石，或者說，理性在打倒了上帝，並且把自己據有了它的寶座時，自己也異化為舊上帝一樣專制、保守、落後的東西。」⁸⁸ 這裡表現出的對自己宣導的理性主義也同樣保持警惕和批判、懷疑態度，恰恰反映了「走向未來」知識群體思想的清醒與批判、懷疑精神的徹底性的。金觀濤也這樣指出：「當某種理性主義的哲學已經陷入盲目的迷信時，非理性主義無疑是人類思想健康發展的一劑解毒藥。甚至在任何一種理性哲學佔主導地位的時代，有意識地讓非理性主義作為補充，讓它作為一種對我們已確定的哲學信念的懷疑，這對於人類不斷進步的理智和良心的健全是十分有益的」。⁸⁹ 這本身就具有一種方法論的意義：對自己「確定的哲學信念」採取既堅守又懷疑的態度，在兩種對立的思維（如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張力中往返旋轉，求得思考的深入和健全。而這背後，是一種拒絕任何迷信和盲從的獨立精神：這才是「科學和理性重建」的真義所在。它同時表明，金觀濤這樣的成長於文革的「四五一代」，認真總結了文革盲從的歷史經驗教訓，他們真正走出來了！

需要討論的，還有第三層面的問題，即「科學與社會的關係」問題。這就是研究者所說的，「走向未來」知識群體「對於科學的關注，不止於科學本身，他們還要通過科學的社會性的角色來建設自律性的知識文化場域」。（皮炯勳，頁 65）

於是就注意到，《走向未來》叢書中的《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

⁸⁸ 陳宜良：《理性主義》（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 251。轉引自皮炯勳，頁 80、83。

⁸⁹ 金觀濤：〈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學〉，《我的哲學探索》，頁 45-46。

技術與社會》(默頓著,范岱年等譯,1986年9月出版),《對科學的傲慢與偏見》(查·帕·斯諾著,陳桓六等譯,1987年6月出版),《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大衛著,趙佳苓譯,1988年5月出版),以及發表在《走向未來》1988年5期的《論科學的自主性》(顧昕)和《奧本海墨案件:美國的科學與政治》(王德祿)等文。《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的譯者在〈譯後記〉裡,明確點出了其中的問題意識:「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在具體政策中,在人們的價值中是否給予科學、技術以及從事科技工作的知識份子的勞動以恰當的評價和積極的鼓勵了呢?是否為發展科學技術創造了良好的環境與氣氛了呢?這是我們今天需要關心、研究並儘快加以妥善解決的一大課題」。⁹⁰這裡所提出的對知識份子的勞動的「評價」和發展科學技術的「環境和氣氛」都是文革所遺留的問題。在前者因為為知識份子平反而得到基本解決以後,後者就成為人們最關心的問題。1981年初著名科學史研究專家許良英在《自然辯證法通訊》裡發表文章,提出「必須具備有利於探索的自由氣氛」的問題,就抓住了要害。特別是許良英引述了愛因斯坦的「三種自由」論:一是「言論自由」,用法律來保證「每個人都能發表自己的觀點而無不利的後果」;二是「每個人要有支配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的自由」;三是「還需要一種內心的自由」,「思想上不受任何權威和社會偏見的束縛,要有自由地獨立思考的精神」,就更引起中國知識份子的強烈共鳴:這三大自由他們在文革中早已被剝奪殆盡。由此得出的結論:「政治上的民主和學術上的自由是科學繁榮的必要保證」,就自然成為文革結束後中國知識界、科技界的一致

⁹⁰ 范岱年等:〈譯者後記〉,《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66-367。轉引自皮炯勳,頁65。

呼聲。⁹¹

「走向未來」知識群體在 1980 年代中、後期的「文化熱」中重提科學和社會的關係問題，自然是延續了對政治民主與學術自由的訴求，但重點卻在以「科學與國家權力的關係」為中心的體制問題，這正是要擺脫「更深層次的桎梏」。他們翻譯的大衛的《科學家的社會中角色》具體考察了英國和法國科學與權力機構的關係，發現英國雖然最初國家積極地保護和促成科學的自律性，但隨著權力機構對於科學的控制逐漸擴大，科學的影響力就隨之減少；而在法國，科學是作為一種反抗性社會運動而存在，被視為啟蒙運動的主要部分，其影響就比英國更為廣泛。這裡實際上提出了兩個方面的問題：權力對科學研究的侵犯顯然妨礙了科學的獨立自主性和影響力；科學自身也有一個如何和政治保持適當距離，實現「非政治的政治性」，確保科學的專業性和中立性，創造科學的「非政治化」的社會條件，科學才能發展。（參看皮垌勳，頁 70）

此時的「走向未來」叢書的知識群體顯然更關注權力對科學的乾預和控制。叢書的作者王德錄即在〈奧本海默案件：美國的科學與政治〉一文裡尖銳地指出，「科學家為了追求科學真理，往往最富有懷疑精神，科學工作要求科學家俱有尊重客觀真理、尊重事實的氣質」，因此「科學家往往容易與政府的現行政策相對抗」，並因此而受到壓制。⁹²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科學只有獨立於國家等權

⁹¹ 許良英：〈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載《自然辯證法通訊》1981 年 1 期（1981 年 3 月）。轉引自皮垌勳，頁 60。

⁹² 王德錄：〈奧本海默事件：美國的科學與政治〉，載《走向未來》1988 年總第 5 期。轉引自皮垌勳，頁 72-73。奧本海默是美國的著名科學家，曾參與美國原子彈計畫，但出於科學家的良知，認為沒有必要發展氫彈，因而被當時的美國聯邦調查局起訴為「蘇聯間諜」，即為「奧本海默事件」。

力關係，才能保持其批判的功能；像文革那樣「政治領導科學」、「科學為政治服務」，剝奪科學家提出不同意見、獨立自主的權利，只能損害作為科學本質的客觀性與批判性，不僅不利於科學自身的發展，也不利於整個獨立的知識領域的形成。（參看皮炯勳，頁 73）

另一位作者顧昕在對「中國科學與政治關係」進行了具體考察與分析以後，強調了「權力」和「影響力」兩個概念，指出：「在政治學中，權力和影響力是不同的」，「在某些非常時期（例如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政治對科學的乾預是權力的表現。而在其他時期，科學的自主性得到某些恢復，但以非權力形式表現出來的政治影響力依然強大，這種影響力遠較權力複雜。它可能是權力在被支配者心中的內化，以致中國的科學家在遇到一些本來屬於科學界內部的問題時，也習慣於採取是諸如『上告』這樣的方式來加以解決，它也可能是『政治萬能主義』的表現」。這裡談到的「權力的內化」揭示的正是我們最為關注的「深層次桎梏」。這在中國，由於「知識份子改造」的長期與有效，是相當普遍的，對權力的依附已經成了許多人（特別是知識份子）的潛意識和本能。這就從根本上傷及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品質，問題的嚴重性莫過於此。

在總結以往中國政治控制科學的歷史經驗以後，論者還提出了「科學的自由」和「科學自主的制度化」，這也是一個關鍵。所追求的「科學自主性」被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科學研究成果的學術評價由科學同行來承擔，一切外部勢力對此沒有發言權」；二是「對科學家的承認分配由科學同行來承擔，一切科學之外的權威對此不應干涉」；三是「科學資源在科學家當中的分配應由科學同行來承擔」。⁹³ 要做到這一點，自然需要制度的保障。科學的發展不

⁹³ 顧昕：〈論科學的自主性〉，載《走向未來》1988年第5期。轉引自皮炯勳，

能離開國家人力、物力上的支持；但又要保證國家不能幹預科學研究的自由與自主，這應該是 1980 年代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遇到了新的歷史機遇時，必須解決的歷史課題。而在這時，「走向未來」知識群體提出「科學」和「理性」重建，正是一個及時的預警，即國家加大對科技發展的支持力度時，一定要防止導致國家權力對科學發展的乾預和控制。這也正是提出「科學」和「理性」重建的初衷與用心所在：如研究者所說，「走向未來」群體是要以科學和理性為旗幟，探索建立「獨立、自由的知識場域」之路。（皮炯勳，頁 75）

討論到這裡，我們可以作一個小結：金觀濤們所要挑戰的，是文革中達到頂點的兩大「深層次思想文化桎梏」：一是「一元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獨佔真理的思想霸權」也即一元化文化導致的文化專制，二是「將矛盾、鬥爭絕對化的非理性思維和行為」。此外，還有「深層次制度桎梏」：黨國體制對思想、文化、學術的無所不在、無所不至的全面、絕對控制。他們所要做的，也只有兩條，一是恢復和宣導「永遠的懷疑與批判」這一科學和理性的核心精神；二是開創獨立、自由、自主的知識空間。

最後，還要對金觀濤的「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的理論作一簡要的考察。

金觀濤這方面的思考成果，集中體現在收入《走向未來》叢書第一批圖書的《在歷史的表像背後——對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的探索》（1983 年出版）；1984 年，金觀濤又寫有《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作更詳盡的論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們的討論主要依據《在歷史的表像背後》一

書。該書一開頭就說，「一股深刻的歷史反省的潮流，正席卷者我們的時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達兩千年之久？」這是因為人們在反思文革時，赫然發現了封建專制借革命之名還魂；由此而形成了全國上下、黨內外的一個共識：「必須克服封建主義的殘餘」，這是思想解放的一個重要任務。研究者即指出了當時黨的領導人鄧小平、葉劍英都有專門論述，最後形成黨的決議。⁹⁴ 金觀濤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也將對封建主義的全民全黨反思看作是「八十年代啟蒙運動的前奏」，而歷史的反省的潮流也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出現的。⁹⁵

從事後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看，這樣的反思、反省並非沒有問題：主要是以「封建」作為歷史反思的關鍵字語，而把中國傳統社會稱為「封建社會」，並以封建代表「落後」、「原始」。如金觀濤後來在再反思中所說，這是「經不起推敲」的，它是以「西方封建社會的歷史發展為標準模式」，「問題本身仍然是西方中心論式」的。⁹⁶ 有意思的是，這樣的有著「歐洲中心論」印記的「中國封建社會論」又是來自馬克思主義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論」。這樣看來，共產黨人在反思文革時比較容易地接受這樣的封建論，也是可以理解的。問題的複雜性更在於，文革後的歷史反思，儘管在理論上存在漏洞和問題，但其所面對的歷史現實問題卻是真實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歷史，並非中國傳統歷史的斷裂，其中許多歷史的負面，例如專制主義在革命旗號下的復活，都是不爭的事實，而且是必須

⁹⁴ 徐友漁：《中國三十年各派社會思潮》（2009年2月28日在三味書屋的演講稿）。

⁹⁵ 金觀濤：〈八十年代的一個宏大的思想運動〉，收入馬國川編：《我與八十年代》，頁167。

⁹⁶ 金觀濤：〈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學〉，《我的哲學探索》，頁30。

正視的。這就是金觀濤所說的，「一個真正有眼光的理論家應不受這個問題表面上的不科學的迷惑，而一眼看到它下面的實質」，「把問題變換到一種較科學的提法：為什麼秦漢以來建立在中國社會的整體結構一直能保持到清末？顯然，所謂超穩定系統的假說正是針對這一問題的」。⁹⁷

金觀濤說這番話時，是 1987 年。到了 1989 年以後，又有了新的反思，這就是當年對歷史的反省局限在對「中國封建社會」即傳統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是不得已為之的，「實際上，這是對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逃避」。金觀濤回憶說，他和劉青峰在文革後期的歷史反思，就是針對從古到今整個中國歷史，並不局限於傳統社會；他們發現的是，「從秦漢帝國一直到今天（按，指文革），中國社會深層次組織方式一直沒有改變，這就是社會的整合建立在人們對某種統一意識形態的認同之上，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與社會組織一體化。正是這種組織方式造成社會主義和封建專制的類似性」。因此，他們在 1974 年寫的六、七萬字的研究提綱是包括了三部分的，即「中國傳統社會組織方式研究」，「用超穩定系統理論對 1840 年至今的中國近現代歷史重新進行詮釋」，以及「用這種社會組織方式來探討文化革命的原因和它帶來的後果」。在 1980 年代他們整理並公開發表的僅是第一部分。這不僅是因為很快陷入歷史的漩渦中心，「活得匆忙，來不及感受」，更是因為他們的穩定結構論一出來即遭到圍攻，根本不可能提出更尖銳的現當代歷史問題，就只有回避了。但在公開發表的部分裡，依然可以看出其內在的「歷史感」，即金觀濤所說的「把人類今天遇到的種種問題和數千年來我們祖先生活的社會聯繫起來，從而產生一種企

⁹⁷ 金觀濤：〈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學〉，《我的哲學探索》，頁 31。

圖超越某一個特定時代、某一種特定文化社會規範來考察歷史的意識」。⁹⁸ 其內在的問題意識，不僅在「為什麼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達到兩千年之久？」更有「這樣的超穩定結構為什麼延續至今？」這是我們今天重讀金觀濤寫於 1980 年代的《在歷史的表像背後》，所應該特別注意的。

而在歷史的當時，金觀濤所要追求的，首先是歷史研究方法上的突破。研究者告訴我們，在 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關於「中國封建社會崩而不潰，隨時會發生復辟」原因的追問，有的強調是因為經濟水準的落後，因此通過經濟發展就可以解除復辟危險，是為「唯物論學派」；有的則更關注和強調文化意識形態即上層建築領域的問題，是為「政治學派」。而金觀濤則拒絕「單一決定論」，而引入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等科學方法論，從整體上來認識和把握社會歷史，其基本要點是：首先把一個社會的整體結構分成三個子系統，即政治、經濟及意識形態，然後根據這三個子之系統之間的耦合程度，來說明社會的穩定程度。（參看皮炯勳，頁 112-113、116）

這就對中國從古至今的歷史，有了一個全新的、整體性的認識。金觀濤、劉青峰把它概括為「社會超穩定結構」，《在歷史的表像的背後》裡，更具體提煉為「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結構的一體化」。⁹⁹ 所謂「一體化社會結構」，是由上層以皇權為中心的官僚機構，中層地主鄉紳自治，以及基層的宗法家族和家庭組織三個層次構成的；

⁹⁸ 金觀濤、劉青峰：〈導言：尋找歷史之路〉，《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頁 2-4、6。

⁹⁹ 金觀濤：《在歷史的表像背後——對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的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13。

而所謂「一體化的意識形態」，就是以儒家意識形態作為社會結構中的上、中、下三個層次的權威合法性來源：無論是上層的官員，還是中層的鄉紳，無一不是接受儒家意識形態的知識份子，即所謂「儒生」；而底層家族、家庭裡的家長的權威性更是來自儒家倫理。這樣，儒生發展成的「士階層」就成了大一統國家的組織者。而這樣的一體化的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結構又是以地主經濟為基礎的。在中國，地主——官僚——鄉紳——儒生（士）是四位一體的。這樣，「意識形態、政治結構、經濟結構」三個子系統之間的相互維繫、協調，就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¹⁰⁰

金觀濤的《在歷史表像的背後》所要著重討論的，也是我們最感興趣的，是這樣的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具有什麼特點？他概括了幾個方面。

一是「強控制」，這就需要「建立及時下達中央號令和收集各地情況的資訊傳遞系統，並建立一個實行強控制的執行網路」。這樣的強控制是全面而徹底，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貫穿於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的各個方面。比如在政治上防止黨派和潛組織的形成，在經濟上控制土地買賣和使商業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內，在思想上防止偏離儒家正統等等」。

二是強控制的另一面：「當系統的實際狀況偏離平衡時，控制中樞要做出靈活又及時的反應，實現調節進而控制」。這樣的「靈活調節」機制是實現強控制的基本保證。但它是依靠官僚機構自身的力量和凌駕於官僚機構之上的皇權來實行一體化調節的，這也就孕育著危機：隨著官僚機構的膨脹與腐敗，以及皇權自身的腐敗（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一體化調節機制也會日益「老化」，逐漸喪

¹⁰⁰ 參看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頁 27-33。

失其調節功能。這就會導致「無組織力量的增長」。這包括政治結構裡的皇權中的外戚和宦官，地方政權中的貪官污吏和基層社會的地主惡霸流氓，以及經濟結構中的無組織力量土地兼併造成的流民，都會形成腐蝕和瓦解既定穩定結構的力量，最後造成以農民起義為標誌的社會動亂。

三，但在中國卻有「奇異的修復機制」。「腐朽的舊王朝在農民起義的猛烈打擊下土崩瓦解」以後，短短十幾年，至多二、三十年，一個「統一的封建大國卻奇跡般重新建立起來，新建王朝在社會結構上卻幾乎是舊王朝的翻版」，「在世界歷史中，很少看到這種『死而又育』的再生現象」。

除了農民起義本身所有的掃蕩、調節作用以外，體制自身也還有兩大「修復模組」，一是當國家組織受到摧毀，與其同構的宗法家族、家庭卻保存下來，就成為新王朝的社會基礎和重建力量；二是儒家意識形態一體化，不僅用其國家學說為新王朝提供立國理論依據，使其獲得意識形態的連續性，而且儒生更是活躍於亂世中，或在農民起義中發揮作用，或輔佐「新主」，影響新王朝，實際上是以舊王朝的組織方式、意識形態重建國家機器，使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的基本形態死而復生。

這樣，我們就看到了以政治結構與意識形態結構一體化為主要特點的中國社會結構，它具有兩種特殊機制與功能：在社會穩定時期，它充分發揮「調節功能」，同時實行「強控制」；在社會發生動亂、瓦解，又發揮「修復功能」（這也是另一種形態的調節功能），摧毀了新生萌芽，使社會回到原有舊結構之中。正是「這兩套調節機制交替發揮作用，保持了社會結構的巨大穩定性」。¹⁰¹

¹⁰¹ 以上討論均見金觀濤：《在歷史的表像背後》，頁 40-41、53、57、60-61、68、70-71、107、114-115、118、120、162。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造成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停滯性」：「一種社會結構能在兩千年歷史長河保持基本不變，在人類文明史上極為罕見」。¹⁰² 這樣的一體化的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結構有極強的同化力，不僅一切外來的文明都被「緩慢而頑強地消化」，「這種消化，柔軟而長久，迫使征服者最終被征服，被同化」，¹⁰³ 而且自身內生（或者受到外來的影響而產生）的新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也最終難逃或變質，或被消滅於萌芽狀態之中的命運。這樣的「以不變應萬變，變了也最終回復」的中國社會、文化結構具有本質上的保守性，這是中國的改革者最感困惑的。也是金觀濤們所面臨的最大困境。如金觀濤在《在歷史的表像的背後》裡所說，「在這種社會系統中，新結構是不可能從封建母體中脫胎而出的」。¹⁰⁴ 也還是金觀濤所說的，「中國歷史上朝代迴圈很可怕，不可小視。超穩定系統的歷史經驗是中華民族應該牢牢記取的」。¹⁰⁵ 這樣的「迴圈」悲劇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隱憂，他們提出「超穩定結構」理論，正是為了從根本上思考這樣的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問題提供理論武器。儘管這一理論並未全面展開，自身也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它所顯示出的解釋力和批判力，確實應該看作是 1980 年代民間思想、文化、學術的重要的理論收穫。

（本期節錄此論文第一部分，下期待續）

¹⁰²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頁 25。

¹⁰³ 金觀濤：《在歷史的表像背後》，頁 186。

¹⁰⁴ 金觀濤：《在歷史的表像背後》，頁 123。

¹⁰⁵ 金觀濤：〈八十年代的一個宏大的思想運動〉，收入馬國川編：《我與八十年代》，頁 175。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專書論文

1. 人民出版社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
2. 中央文獻出版社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3. 甘陽：《八十年代文化意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4. 仲維光、還學文：《意識形態陰影下的知識份子》，Böcklmann : Brockmeyer, 1994 年。
5.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 年。
6.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 年。
7. 金觀濤：《在歷史的表像背後——對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的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
8. 金觀濤：《我的哲學探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
9. 馬國川編：《我與八十年代》，北京：北京三聯，2011 年。
10. 陳子明、徐友漁：〈關於八十年代思想派別與《二十世紀文庫》的通信〉，《陳子明文集》第 2 卷，香港：世界華文傳媒出版機構，2010 年。
11. 湯一介：《文化的回顧與展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
12. 湯一介：《在非有非無之間——湯一介先生自述》，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17 年。

13. 劉青峰：《讓科學的光芒照亮自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
14. 劉曉：《意識形態與文化大革命》，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年。
15. 樂秀成：《GEB：一條永恆的金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
16. 樂黛雲：《何處是歸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 年。
17. 編委會：《《文化：中國與世界》三十年（1986-2016）》，上海：三聯書店，2016 年。
18. 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中心，2008 年。
19. 錢理群：《1949-1976：歲月滄桑》，香港：城市大學，2017 年。
20. 錢理群：《燭火不息：文革民間思想研究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 年。
2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年。
22. 灌耕編譯：《現代物理學和東方神秘主義》，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

二、期刊論文

1. 傅世悌：〈一切為了饑渴者和盜火者——對《走向未來》叢書的一點回顧和思考〉，《中國出版》，1986 年第 7 期，1986 年 7 月，頁 30-33。
2. 趙和平：〈張黎群和《走向未來》叢書〉，《河南教育（高校版）》，2005 年第 2 期，2005 年 6 月，頁 54-55。

3. 劉青峰：〈二十世紀中國科學主義的兩次興起〉，《二十一世紀》，1991 年 4 月號，1991 年 4 月，頁 32-47。
4. 龍春：〈《走向未來》命運如何？〉，《中國圖書評論》，1990 年第 1 期，1990 年 3 月，頁 132-133。

三、學位論文

1. 皮炯勳：《1980 年代「科學」和「理性主體」的重建——以《走向未來》叢書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3 年。
2. 陳麗芳：《《走向未來》叢書出版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傳播學碩士論文，2013 年。

四、報紙

1. 人民日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 年 8 月 8 日通過），《人民日報》第 1 版，1966 年 8 月 9 日。

